

全球对话

13.1

GLOBAL DIALOGUE

一年出版3期，以多種語言刊出

与 Brigitte Aulenbacher 和 Klaus Dörre 谈社会学

Breno Bringel
Carolina Vestena
Vitória Gonzalez

朝第二十届ISA世界社 会学大会出发

Sari Hanafi
Anahí Viladrich
Geoffrey Pleyers
Rosana Pinheiro-Machado
Tatiana Vargas-Maia

多重宇宙与生态 社会学转型

Maristella Svampa, Alberto Acosta,
Enrique Viale, Breno Bringel,
Miriam Lang, Raphael Hoetmer,
Carmen Aliaga, Liliana Buitrago,
Vandana Shiva, Mónica Chuji,
Grimaldo Rengifo, Eduardo Gudynas,
Lesley Le Grange, Christelle Terreblanche,
Cormac Cullinan

理论观点

José Maurício Domingues

议题开讲

- > 开放科学的挑战
- > 多重社会学的南方概念
- > 拉丁美洲社会学与当代文明危机
- > 破碎的巴西
- > 伊朗：这不是抗议，而是一场革命

MAGAZINE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isa

第13卷 / 第1期 / 2023.04
<https://globaldialogue.isa-sociology.org/>

GD

> 主编的话

我感到很荣幸能欢迎各位读者来到2023年的第一期刊物，这也是我们新团队在全球对话的首次成果。2022年末，从ISA副主席 Eloísa Martín 那儿得知我将担任本刊的新任主编时，我感到非常兴奋。我想感谢由 Brigitte Aulenbacher 和 Klaus Dörre 的领导的前一个编辑团队，在他们的努力下，这次交接格外地顺畅。我也要谢谢助理编辑 Raphael Deindl、Johanna Grubner、Walid Ibrahim 以及 Christine Schickert，他们在过去几年内对本刊物付出许多，并有丰硕的成果。Aulenbacher 和 Dörre 教授将继续在团队中服务，而创刊编辑 Michael Burawoy 也将持续担任编辑顾问。这些人对于本刊接下来的发展与改革，将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

我们的管理编辑 Lola Busuttil 是本刊物团队最资深的人员之一，他确保了这次交接的顺利，也将和 August Bagà-Toffa Evans，以及来自各国、致力贡献的编辑，一同成为本团队最坚实的力量。

自2010年发行以来，全球对话有着显著的成长。全球对话最初只是以手工制作的报纸形式发行，触及范围相较有限。十多年后，全球对话成为了以超过十二种语言发行的刊物，其中的稿件来源横跨全球，让各地的社会学家有机会在此互相学习、分享其他地区的世界、研究成果以及当代社会议题。

我们应该持续巩固、拓展这项重要的成果。我们目前已经确立了全球对话接下来的三个主要目标：由ISA甚至ISA之外出发，推广公共与全球社会学、重建并加强全球对话编辑专题的稳定、重构交流与传播的策略。

对于上述目标我有许多想法，不过在执行他们之前，我也想听听你们的意见。为此，从现在开始到明年6月在墨尔本举行的第二十届ISA世界社会学大会，我将在助理编辑 Carolina Vestena 和 Vitória Gonzalez 的协助下，于ISA社群内展开讨论。两人都是出色的全球年轻社会科学家，具有编辑经验、致力于公共社会学。Carolina 以及 Vitória 目前分别身在德国卡塞尔和巴西里约热内卢。

本期刊物以一场访谈为开头，受访者为本刊前编辑 Brigitte Aulenbacher 和 Klaus Dörre。其中，他们解释自己如何将公共社会学转化于自身的研究议程，也分享了两人在担任全球对话编辑时面临的挑战，以及如何理解从公共到全球社会学的走向。

第一个专题着眼于澳洲下一次的ISA大会。Sari Hanafi 介绍本次大会的一些主要议题，Anahí Viladrich 反思如今正过渡于线上与线下形式之间的世界。Geoffrey

Pleyers 则讨论当代全球社会学面临的核心挑战，以及ISA能如何面对这些挑战。Rosana Pinheiro-Machado 和 Tatiana Vargas-Maia 的文章则触及了大会的核心议题之一——当代威权主义，并探讨我们为什么需要一个新的框架来研究当代的极右势力。

第二个专题的主要目标，是为 Ashish Kothari、Ariel Salleh、Arturo Escobar、Federico Demaria 和 Alberto Acosta 等人跨地域共同完成的一项成果：《后发展辞典——Pluriverse》提高关注度。在本专题内这些令人振奋的作品中，我们将会收录杰出行动份子与知识分子的短文，以呈现全球对话的潜力。这些作品的话题包含：发展的替代方案（Vandana Shiva）、美好生活（Mónica Chuji、Grimaldo Rengifo 和 Eduardo Gudynas）、乌班图（Lesley Le Grange）、生态女权主义（Christelle Terreblanche）和自然权利（Cormac Cullinan）。此外，南方生态社会与文化公约的成员（Maristella Svampa、Alberto Acosta、Enrique Viale、Miriam Lang、Raphael Hoetmer、Carmen Aliaga、Liliana Buitrago，还有我）也共同撰写了一篇文章，讨论生态社会转型的地缘政治。在文章里头，我们批判北方主导的霸权式生态转型如何塑造新的环境剥削，其不只使生态债务不断积累，更强化了绿色殖民主义、扩大了全球南方的牺牲。相关的替代方案，也将是这篇文章和本专题的主要焦点。

在理论专题中，José Maurício Domingues 尝试探讨后疫情世界是否导致新的现代性产生。他对于国家发展趋势、经济与社会政策的的历史学／社会学分析，将协助我们跳脱出对于疫情的那套俗烂解释。

最后，于议题开讲中，我们结合了三篇文章，介绍当代社会学遭遇的不同挑战。Fernanda Beigel 讨论了社会科学如何面对开放科学的要求，并展示其研究结果及过程。Mahmoud Dhaouadi 提出了涉及多元社会学的南方概念；而拉丁美洲社会学协会的成员，则试图于文中分析当代文明的危机和社会学在当地的作用。另外，还有两篇文章以巴西和伊朗的情势为主题。其一是由 Elísio Estanque 和 Agnaldo de Sousa Barbosa 撰写，他们认为要理解巴西目前两极分化的现象，需要将时间跨度拉得更长。为了作者的生命安危，第二篇文章以化名发表，其针对伊朗最近的抗争进行分析。我们不能将这些情况正常化，也不能在面对猖獗的独裁主义时保持沉默。全球对话将继续致力于严谨的社会学分析，同时向全球的不公义现象声明立场——我们支持新的国际主义！■

Breno Bringel，《全球对话》编辑

> 全球對話以多種語言刊出，請至 [GD 網站](https://gd.org/)。

> 投稿來信寄給 globaldialogue.isa@gmail.com。

> 编辑团队

主编: Breno Bringel.

助理编辑: Vitória Gonzalez, Carolina Vestena.

副主编: Christopher Evans.

执行主编: Lola Busuttil, August Bagà.

顾问: Michael Burawoy, Brigitte Aulenbacher, Klaus Dörre

媒体顾问: Juan Lejárraga.

顾问编辑:

Sari Hanafi, Geoffrey Pleyers, Filomin Gutierrez, Eloísa Martín, Sawako Shirahase, Izabela Barlinska, Tova Benski, Chih-Jou Jay Chen, Jan Fritz, Koichi Hasegawa, Hiroshi Ishida, Grace Khunou, Allison Loconto, Susan McDaniel, Elina Oinas, Laura Oso Casas, Bandana Purkayastha, Rhoda Reddock, Mounir Saidani, Ayse Saktanber, Celi Scalón, Nazanin Shahrokni.

各国编辑

阿拉伯世界: (突尼西亚) Mounir Saidani, Fatima Radhouani; (黎巴嫩) Sari Hanafi.

阿根廷: Magdalena Lemus, Juan Parcio, Dante Marchisio.

孟加拉: Habibul Khondker, Khairul Chowdhury, Bijoy Krishna Banik, Abdur Rashid, Sarker Sohel Rana, Md. Shahidul Islam, Helal Uddin, Masudur Rahman, Yasmin Sultana, Ruma Parvin, Sharmin Akter Shapla, Saleh Al Mamun, Ekramul Kabir Rana, Farheen Akter Bhuian, Khadiza Khatun, Aysha Siddique Humaira, Arifur Rahaman, Istiaq Nur Muhit, Md. Shahin Aktar.

巴西: Fabrício Maciel, Andreza Galli, Ricardo Visser, José Guirado Neto, Jéssica Mazzini Mendes.

法国/西班牙: Lola Busuttil.

印度: Rashmi Jain, Rakesh Rana, Manish Yadav, Pragya Sharma.

伊朗: Reyhaneh Javadi, Niayesh Dolati, Sayyed Muhamad Mutallebi, Elham Shushtarizade.

哈萨克: Aigul Zabirowa, Bayan Smagambet, Adil Rodionov, Almash Tlespayeva, Kuanysh Tel, Almagul Mussina, Aknur Imankul, Madiyar Aldiyarov.

波兰: Aleksandra Biernacka, Joanna Bednarek, Anna Turner, Marta Blaszczyńska, Urszula Jarecka.

罗马尼亚: Raluca Popescu, Raisa-Gabriela Zamfirescu, Bianca Mihăilă, Diana Moga, Luiza Nistor, Ruxandra Păduraru, Maria Vlăsceanu.

俄罗斯: Elena Zdravomyslova, Daria Kholodova.

臺灣: 李宛儒, 呂道詠, 洪柏勝, 廖宇雯, 黃翊碩, 簡芊樞, 郭智豪, 賴奕瑋, 林韻柔, 周芸瑄.

土耳其: Gül Çorbacıoğlu, Irmak Evren.



在这场访谈中, **Brigitte Aulenbacher** 和 **Klaus Dörre** 的讨论聚焦于公共及全球社会学的一些挑战, 以及这两个概念如何在两人的研究议程以及《全球对话》中发挥作用。

XX ISA World Congress of Sociology



Resurgent Authoritarianism:
Sociology of New Entanglements of Religions, Politics, and Economies

Melbourne, Australia | June 25-July 1, 2023
Melbourne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Centre
www.isa-sociology.org



本专题以**第二十届ISA世界社会学大会**为主题, 其中的文章反思这场活动的一些核心主题, 例如当面开会以及结合线上线下的开会形式面临的挑战、全球社会学和全球对话的革新, 以及极右派的发展。



多元宇宙和生态社会学转型的专题, 则探讨了一些相关的核心概念, 如 **Buen Vivir**、发展、生态女性主义、绿色协定、自然权利和 **ubuntu**。

封面照片来源: Pixabay。



Global Dialogue 由 SAGE 贊助

> 目錄

主编的话	2	爬梳生态女性主义辩论	
		Christelle Terreblanche, 南非	29
> 社会学对话		自然权利与地球法学	
公共与全球社会学的挑战: 专访 Brigitte Aulenbacher		Cormac Cullinan, 南非	31
与 Klaus Dörre			
Breno Bringel, 巴西/西班牙; Carolina Vestena, 德国;		> 理论观点	
以及 Vitória Gonzalez, 巴西	5	后疫情趋势与现代性的诸阶段	
		José Maurício Domingues, 巴西	33
> 朝第二十届ISA世界社会学大会出发			
欢迎参加于墨尔本举办的第二十届 ISA 社会学世界大会		> 议题开讲	
Sari Hanafi, 黎巴嫩	8	(重新) 开放社会科学: 开放科学的挑战	
后疫情时代: 重燃对于实体会议的信心		Fernanda Beigel, 阿根廷	36
Anahí Viladrich, 美国	11	多重社会学的南方概念	
全球社会学作为一种崭新的全球对话		Mahmoud Dhaouadi, 突尼西亚	39
Geoffrey Pleyers, 比利时	13	拉丁美洲社会学与当代文明危机	
为什么我们需要新的架构研究全球南方的极右派		拉丁美洲社会学学会	40
Rosana Pinheiro-Machado, 爱尔兰;		破碎的巴西	
Tatiana Vargas-Maia, 巴西	16	Elísio Estanque, 葡萄牙;	
		Aginaldo de Sousa Barbosa, 巴西	42
> 多重宇宙与生态社会学转型		伊朗: 这不是抗议, 是革命	
绿色协定与生态社会转型的地理政治学		伊朗之聲, 伊朗	44
Maristella Svampa 和 Enrique Viale, 阿根廷; Alberto			
Acosta 和 Miriam Lang, 厄瓜多尔; Breno Bringel, 巴西			
/西班牙; Raphael Hoetmer, 秘鲁; Carmen Aliaga, 玻			
利维亚; 以及 Liliana Buitrago, 委内瑞拉	19		
为了百分之一的发展			
Vandana Shiva, 印度	23		
「Buen Vivir」: 系谱学和展望			
Mónica Chuji, 厄瓜多尔; Grimaldo Rengifo, 秘鲁; 以及			
Eduardo Gudynas, 乌拉圭	25		
Ubuntu: 一种正义且赋权的概念及其生活方式			
Lesley Le Grange, 南非	27		

『随着社会阶层两极化的时代来临, 我们将逐渐不再有机会进行理性的公共辩论。』

Sari Hanafi

> 公共与全球社会学的挑战：

专访 Brigitte Aulenbacher 与 Klaus Dörre

Breno Bringel，全球对话日后的主编，以及 Carolina Vestena 和 Vitória Gonzalez，全球对话日后的助理编辑



Brigitte Aulenbacher。来源：人事档案。



Klaus Dörre。来源：人事档案。

全球对话编辑(GDE)：你是如何将自身的在地网路、于ISA的跨国参与，以及公共社会学的概念与你的研究议程结合的？

Brigitte Aulenbacher (BA)：透过公共社会学的概念，科学知识得以被传播，也刺激了学术／非学术受众之间的对话，使得社会学的学术工作能承接不同社会领域的讨论。以提出此概念的 Michael Burawoy 的角度来说，公共社会学即是用来描述社会学家提供他们的科学知识（「传统」公共社会学），或是参与由公民社会发起的倡议（「有机」公共社会学）。作为一名批判社会学家，我的议程有两个面向：其一是将社会理论，特别是从女性主义和交织性来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其二是结合工作、劳动、照护与科学转型的实证研究——这包含数位化、家务劳动和老年家庭照护、住宅

照护、高教市场化等现象。我们可以第二个全球化时代（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视为一个转折点，因为我们正见证资本主义的转型、其最终导致的经济、生态、社会与政治危机，以及随之而引发的大量抗议活动。

就我的理解，这样的发展是起因于人们忽视了资本主义经济的结构因素。资本主义经济根植于现代欧洲中心主义与对等中心主义，即人类应该要借由人、科学技术的进步，试图掌握人、自然、竞争、成长。在积累、利润和市场驱动的生产模式下，资本主义经济不只将生态与社会需求视为次要的，也透过制定物品的价格，将生态、社会需求抛到脑后。这些与性别、种族与阶级的支配相辅相成。从气候变化、日益加剧的贫穷、四溢的不平等现象来看，资本主义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其引发的政治效应——如全球各地窜出

>>

的专制体制——皆是显而易见的。在奥地利的「双重运动」(double movement)之下,我们重新拾起波兰尼的现代经典,也成立了国际波兰尼协会,希望能善用其对市场资本主义历史的见解——市场本位主义可能对生态、劳动、货币造成什么破坏?我们可以利用什么样的知识、关怀或其他所谓的「虚构商品」?如何结合各种反抗,例如由工会为代表的劳动社会运动、周五为未来而战运动、照护倡议等等,一同抵抗新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带来的灾难。不管是在地还是跨国网路,甚至是全球对话专题中,公共社会学都将以社会学理论、实践与政治等多个面向,来分析新自由主义底下正转型的资本主义、工作与劳动、照护与科学。

在我们这个领域中,对于社会学是否、应该以及如何走向公众,还相当缺乏共识。我们应该只是观察、分析和描述社会发展,还是应该插手干预?由于社会学也是社会——其研究对象——的一部分,无论是当代发展的反思、分析,还是针对人们的活动,学者们都没有任何立场告诉人们必须做什么。但是,社会学家可以提供科学知识,激发辩论,作为研究者,也可以成为不同行动者联盟的一员,一同协商未来的前景,以及保障、维持生计的方式。在我的研究领域中,就有许多人和博物馆、公共教育机构、教会、工会或其他机构合作。全球对话汇集了世界各地的文章,对在地和国际层面的讨论都是有意义的。

Klaus Dörre (KD):我自己第一次接触到 Michael Burawoy 的公共社会学,是在2012年一次于约堡举办的 [SWOP](#) 会议上。在那之前,在使用德语的社会学界中,不太有人知道这个概念。我当时立刻就觉得:就是这个!在公共社会学小组的辩论中,我认知到这个取径能够为研究概念提供创新,且这和我研究团队在做的事情有一定程度的接近。于是,我和 Brigitte Aulenbacher 等人试图将有关公共社会学的辩论带入迄今为止有些无知的德语社会学界,虽然学科内仍有许多人持保留意见,不过我们还是成功了。在耶拿,公共社会学的概念现在已经成为一种标准。这也适用于我的研究小组,比如说,我们就从有机公共社会学的角度研究劳动关系和工会。

在有机公共社会学方面,我目前最为重要的经验是与气候运动左翼团体的紧密合作。受到德国莱比锡有1500人参加的「学生为未来」组织启发,我写了《Die Utopie des Sozialismus: Kompass für eine Nachhaltigkeitsrevolution》(社会主义的乌托邦:持续发展革命的指南针)一书,这本书在气候运动中有广大的回响。我和这些学生一起开始了「由下而上改革社会主义政治」活动。我们正在研究那些于在地成功实行解放社会主义政治的案例,有的案例需要直面主流趋势的抵抗,这些抵抗的力量甚至可能来自全世

界。除了德国的工作小组,巴西、阿根廷、智利、法国、希腊、义大利、葡萄牙和其他国家也有团体对此感兴趣。我们希望扩大网路,可能的话,扩展到每个洲。我们计划将经验性的个案研究结合,以布尔迪厄的《世界的苦难》的思路进行分析,不过我们对于寻找有助于克服世界苦难的方法也很感兴趣。此外,创新的集体财产形式、阶级斗争、生态与社会之间的冲突及相互作用,也是我们试图关注的。我们希望能邀请所有对这些主题有兴趣的人合作。

GDE:作为全球对话的编辑,在将杂志的展望推广至全球的计划上,你们目前遇到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BA:虽然我们核心编辑团队的跨国连结非常紧密,但仅凭这一点,还不足以涵盖这么多国家的社会学。我认为至少有三个挑战。首先,学科内部的霸权主义、阶级制度和权力关系,使得全球北方和西方的社会学,在传播、受到肯认和散播影响上享有特权。如果有区域编辑团队,或是团队外部的年轻学者申请组织一个专题,例如「社会学对话」,他们往往会认为在自己国家的社会学里头,有一些重要的社会学成果从未进入国际视野。其次,ISA主席以及执行委员会作为编辑顾问的大力支持,让介绍全球社会学成为可能。举例来说,Margaret Abraham 和 Sari Hanafi 走访各地,邀请不同国家的同仁一同贡献,又例如执行委员会的同事,组织了不同国家的专题。第三,是我们知识生产的一个缺口,而且是最难处理的缺口:从全球北方/西方视角撰写的全球南方/东方的发展研究很多,反之却较少。如何将由后者视角出发的作品纳入是一个挑战。

KD:在我看来,一个核心问题是德语区和(西)欧洲社会学在不同程度上仍残留的狭隘心态。我们太常将视野侷限在自己原有的概念里面,且在长期受到资本主义侵蚀的西欧社会中进行研究。对我来说,要从这种狭隘挣脱出来并不容易。在全球对话和拉丁美洲社会科学理事会网路的合作中,这一点逐渐在我眼中变得清晰。所以说经常听到有人批判我们是欧洲中心主义,这样的指责也是有道理的。这些情况确实阻碍了全球社会学的交流。然而,在全球范围内,有些欧洲的社会学观点也是有其正当性的。举例来说,当我建议在全球对话中设立乌克兰战争专题时,有些人拒绝或抱持质疑。这些质疑显然是被误导了:「虽然乌克兰战争的伤亡不少,但同时世界各地发生的另外二十多场战争却没有得到相同程度的关注」,这种说法当然合理,但在分析上是错误的。乌克兰战争是一场涉及世界新秩序战争,其中包括握有核武器的大国之间对决所潜藏的危险。这场战争的后果,是一场全球性的战争,这使得我们有必要重溯汤普森的「灭绝主义」,并为其注入新的内容。灭绝主义指的是经济、政治秩

>>

序和意识形态机制作为特定方向的推力，最终不可避免地导致大量人口灭绝。用 John Bellamy Foster 的话来说就是，乌克兰战争催化了「双重灭绝主义」。即使能避免核战争，加速军备武装与剥削主义的生产模式，也还是会极大化生态灭绝的风险。

GDE: 最后一个问题：对你们来说，在思考未来该如何行动时，公共社会学中的哪一个观点是最值得重视的？这题就换个顺序，让 Klaus 先回答吧。

KD: 双重灭绝主义也与社会学这个学科和全球对话有关——我们必须自问，我们可以用社会学的手段、方法做些什么，来使这世界迫切需要的事物——一场社会／生态的永续发展革命得以发生。我们必须终止自新石器时代革命以来一直存在的，与非人类自然和其他生物的工具关系。只有身在比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更加平等、民主的世界中，此情景才可能实现。如果这样的追求失败了，就会出现更多打着「拯救自己！」口号的专制主义出现。相较于我们面对经济生态危机所提出的渐进式方案，这种新的威权主义，甚至法西斯主义，是更可能发生的。我们必须更有力地将转型议题推广至全球社会学的中心。自罗马俱乐部发布第一份报告时我们就已经知道，由于全球暖化和资源开发，世界正走向「深渊」。为何在知道这些的情况下，50年后的我们，仍然在为同样的问题而努力，甚至，真正持续发展的，却是无法永续发展的那些项目？如何才能改变这种状况？我们需要什么类型的社会，才能为永续革命提供支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意识到：就如已经被遗忘，却难掩其重要的德国社会学家 Karl Hermann Tjaden 所言，永续是暴力的对立面。暴力在战争、性别、种族关系，或是基于阶级的剥削中体现。

对于永续革命的追求，也提醒着社会学家——我们必须重新思考自己在社会中的角色。我们不仅需要走出象牙塔，如 Michael Burawoy 多年前建议的那样，我们还应该思考如何重新定位公共社会学。Karl von Holdt 并未顺从学科安于现状的主流，却在他的新书中提出「批判性参与」，作为公共社会学的解放变体。这种值得全世界讨论的有效方法，已经受到学生的热烈欢迎，因为对他们来说，可以是「右派」的公共社会学定义，实在太过不明确。在职涯遭受各种限制的情况下，这些学生还能兼弟弟如此认为，对我而言就像是看见了希望。

BA: 我想提的有两个面向。首先，就我而言，社会学和艺术之间的合作有很大潜力。艺术研究的新分支，以及艺术家对社会当代／未来发展辩论的贡献是很明显的。我们的编辑团队已经和艺术家展开合作，例如请他们提供图文、照片、图像和艺术研究。除此之外还有更多方式，也可以透过在地方／全球层面将社会学与艺术结合，为接触学术／非学术受众开闢途径。其次，全球对话能汇集全球不同研究领域对当代社会发展的分析来促进讨论。不仅于此，同样需要采取或推动的，是建立跨国的研究网路，为不同社会学与国家的观点创造空间，同时借着网路的建立，以寻求社会对发展的共识、解决这个时代最迫切的问题。就我的理解，公共社会学必须成为这类研究议程和网路中重要的一员——其牵涉到资讯传播策略的发展，以及各领域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合作。■

來信寄至：

Brigitte Aulenbacher

<Brigitte.Aulenbacher@jku.at>

Klaus Dörre

<klaus.doerre@uni-jena.de>

> 欢迎参加于墨尔本举办的第二十届 ISA 社会学世界大会

Sari Hanafi, American University of Beirut, 黎巴嫩, ISA 主席 (2018-23)

我们终于要见面。当最终为第二十届 ISA 社会学世界大会定下日期,还有许多问题没解决:应该以线上、综合还是现场的方式举行?谁可能没办法参加?谁可能对与他人靠得太近感到害怕?在因疫情导致的几乎有三年之久的线上会议以后,这场将举行的现场活动看起来像个历史性的时刻。

我们设想了不同的情况,但就目前收到了7126篇摘要来看,结果是令人感到鼓舞的。在这些摘要中,有三分之二的是准备在现场进行报告的,另外三分之一则采线上方式。节目协调员已经对提交的资料进行很好的评估,并从124个国家中录取了6408份摘要。与上一届(2018)在多伦多举办的世界大会相比,摘要的录取率上升了百分之十九。我们于此邀请所有被录取者在报告者注册的截止日期即2023年3月22日以前完成注册。

本次大会的节目是节目委员会多次开会的主题,节目委员会的组成如下:四位副主席(Filomin Gutierrez-Eloísa Martín、Geoffrey Pleyers 以及 Sawako Shirahase)、地方组织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 Dan Woodman、四位研究协调委员会成员(Hiroshi Ishida、Allison Loconto、Susan McDaniel 以及 Nazanin Shahrokni)、四位国家协会联络委员会成员(Elina Oinas、Bandana Purkayastha、Celi Scalon 以及 Borut Rončević)、特邀客座人物 Armando Salvatore 以及我本人。由 Dan Woodman 主导的地方组织委员会承担了巨大的后勤工作。我想要为他们的伟大工作向他们表示感谢。我们已经制定了精彩的节目,大部分讲员都将亲临现场。容我再分享一些亮点。

当我们把这次 ISA 世界大会的主题定为「复甦的极权主义:宗教、政治与经济的新纠缠社会学」(Resurgent Authoritarianism: Sociology of New Entanglements of Religions, Politics, and Economies),极权主义还没如现在那样普及,包括在全球北方。特别是当国家保守主义计划取代了自

由主义政治计划以及公共理由变得既不能处理正义的统一概念也不能处理社会中不同的善的概念之时,透过极端民族主义并宗教狂热的结合,公共文化逐渐的「符号增厚」促进了极权主义的增长。随着社会的等级分化愈发严重,我们生活在一个理性的公共辩论变得少有可能的时代。这是个被高涨的民粹主义以及存在于我们的学术和媒体之间、宗教和世俗之间以及它们与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关系中的诸种误解所驱动的煽动性的时代。宗教信仰在大部分地区增加了,而世俗主义在某些国家里也成为了一种公民宗教,为了对抗其它宗教,特别移民所带来的外来人口的宗教。

> 主席小组与全体会议

在这理论框架中,我们构想了一项包含有两个旨在将社会学连结到道德与政治哲学上去主席小组的计划。

第一个小组的主题为「自由主义、他者和宗教」,由两位哲学家和两位社会学家来辩论这个主题。法国哲学家 Cécile Laborde 为最小限度的世俗主义辩护,而巴勒斯坦哲学家 Azmi Bishara 则将论证,如过整全性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如公民自由和个人自治,在主流文化的背景下能够重现,那么就是可促进的。对于巴西-比利时社会学家Frédéric Vandenberghe来说,对社会不平等及社会病态的社会学批判是紧贴着「自由社群主义」的剧目的:它有时倾向身份及诚实性的社群一极,有时则倾向于自主与正义的自由一极。最后,对非洲社会学家 Anna Halafoff 来说,宗教的角色在于促成及抵制宗教民族主义兴起时表现出来的反世界恐怖。

第二个小组是关于「建立一个公正的后疫情世界」。新冠疫情的超现实氛围曝露了人类、国家、公民与政府之间信任的断裂。它迫使我们提出关于自身、我们的社会关系以及普遍意义上的生活的重大问题。这一危机时刻可能成为积极应对这一新现实及其伴随而来的猛烈的不确定性的机会。虽然这一

XX ISA World Congress of Sociology



Resurgent Authoritarianism:
*Sociology of New Entanglements of
Religions, Politics, and Economies*

Melbourne, Australia | June 25-July 1, 2023
Melbourne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Centre
www.isa-sociology.org



全球危机可能激起加强剥削、剥夺以及新自由资本主义的新策略并且增扩了我们的贪婪和自私的范围,但它也允许我们去探索及为理解和重新获得我们的人性和社会正义提供新的方法。Didier Fassin 将指出没有在疫情中学习到的教训,主要专注在公共卫生和社会不平等问题。对他来说,健康危机揭示了大多数国家公共卫生的缺陷以及国家内或国家之间社会不平等的深度。Eva Illouz 则对作为后疫情时代所揭示的反民主情绪的恐惧感兴趣。同时,Afe Adogame 以其迦纳人的敏感性,阐明了以无数方式上演的诸宗教、科学与疫情之间的关系。当科学挑战宗教在提供保护、医治、安全以及希望的合法性及效力时,宗教也反过来对抗科学作为万能药的功效和权威。最后,面临着新冠疫情的冲击,Li Peilin 则认为现代世界系统理论、冷战理论以及文明冲突理论都无法理解区域性的冲突以及世界经济衰退的威胁。他于是呼吁建立更具包容性的后西方社会学,为建立世界和平秩序贡献。

这些小组外,还会有八场全体会议分别处理四个不同主题:后世俗性(post-secularity)或多重世俗性(multiple secularities)视角下的世俗主义;极权主义,特别是其残暴版本及对知识和后实况性(post-factuality)的影响;民粹主义及其全球现象的不同形式,以及一个邀请——以一种交织的取径来理解「人」之概念的建构及新自由主义,它导致了如此多不平等,并危害个人和集体的生命权。

> 焦点会议

由于我们的目标是本届大会不仅仅是跨学科的谈话,而且要与媒体、公民社会的行动者和政策制定者交流,由此我们设想了三场焦点会议,专注在讨论三个紧迫的趋势和冲突。

第一场会议是关于种族主义和伊斯兰恐惧症。虽然在民权时代之后,公开的种族主义被广泛地谴责,但我们如何概念化及测量其更微妙和扩散的当代表现?这场会议将特别专注在伊斯兰恐惧症的兴起。Nacira Guénif 会论证,与其把整合当作种族主义以及更何况是伊斯兰恐惧症的解方,不过看看,在法国和其它地方,整合的修辞如何促进了种族主义实践与论述,同时容许了轻视的政策并为一种持久的伊斯兰恐惧症开闢道路。而对于 François Burgat 来说,欧洲与穆斯林世界的张力和断裂,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区域的,都可以分析为诸种历史动态的结果。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这些断裂基本与全球性的宗教事态没什么干系,反而是与内部的以及政治事务有关。作为一个社会学家和运动家,Randa Abdel-Fattah 会指出,澳大利亚的边缘化社区是如何被屈服于关于「温和的/政治的/整合的」穆斯林的常识性观念和脚本的持久和诱人的力量的穆斯林「领导阶层」背叛的。最后,Farid Hafez 会着重在穆斯林社会中的伊斯兰恐惧症,把它视作控管与规训穆斯林的一种方式,从而将其框定为是政治的。在许多穆斯林国家(比如在西亚的一些国家),国家机构正在推动法律以歧视那些在政治上反对当权者的穆斯林。Hafez以这种方式超越了多数-少数的关系动态。

第二场焦点会议将针对乌克兰战争提供一个社会学的视角。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犯震惊了世界。这不是一场孤立的战争;它是例外的因为它有可能逐步扩大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并且可能是核武战争。撇开地缘政治不谈,Nikolai Genov、Olga Kutsenko、Larissa Titarenko 以及 Tamara Martsenyuk 等四位小组成员,将探讨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社会变革,这些变革使导致战争的社会条件得以发展。他们也将思考这场战争对两个社会的未来变革可能带来的影响。这场战争还对欧洲产生了

>>

更廣泛的影響並帶出不同的問題如歐洲觀念的發展、難民危機的影響、糧食和能源匱乏對全球社會的衝擊、批判性地評估戰爭的學術自由等。

最後一項焦點會議是關於阿拉伯-以色列衝突。一些人將這一衝突解讀為延續自1948年的移居者-移民計劃並且針對巴勒斯坦人建立了種族隔離制度，而另一些人則解讀為阿拉伯與以色列猶太之間的民族主義衝突。無論這個衝突如何被解讀，一個緩慢地發生在巴勒斯坦領土的「空間消滅」進程在任各個層面上都是相當明顯的。和平進程（即所謂的奧斯陸進程）沒有加以阻止。許多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學者爭論說兩國方案已隨著奧斯陸進程的失敗而崩潰了，從而我們應該致力於為所有公民建立一個世俗國家。四位小組成員將反思這一主題：巴勒斯坦社會學家 Mohammed Bamyeh 和 Areej Sabbagh-Khoury，以及以色列社會學家 Ian Lustick 和 Lev Grinberg。

> 前主席小組及 ISA 的歷史

2023年6月於墨爾本，我們將慶祝第二屆的 ISA 社會學世界大會。為了凸顯這個重要的周年紀念，我將我的主席計劃著重於發布過往所有大會的摘要並更新 Jennifer Platt 傑出的作品《ISA 1948-1997歷史》上。有兩項研究被託付出去了。一項是由 Gisèle Sapiro 實行的，檢視了過去大會選定的研究委員會的全体會議和計劃，並分析了它們在主題、理論和方法上不斷變化的形式和內容。Tom Dwyer 實行了另一項研究以更新自1997年至今的《ISA 的歷史》。前 ISA 主席 Margaret Archer、T.K. Oommen、Alberto Martinelli、Piotr Sztompka、Michael Burawoy 和 Margaret Abraham 也將對這兩項研究進行評論。

> 當作者遇見批判家

我們已為這些會議選定了六本由不同地理區域的社會學家所著或編輯的精彩好書，伴隨著令人興奮及適時的主題：

- *Critical Engagement with Public Sociology: A Perspective from the Global South* edited by Andries Bezuidenhout, Sonwabile Mnwana, Karl von Holdt
- *The Gift Paradigm: A Short Introduction to the Anti-Utilitarian Movement in the Social Sciences* by Alain Caillé
- *Aesthetic-Cultural Cosmopolitanism and French Youth: The Taste of the World* by Vincenzo Cicchelli and Sylvie Octobre
- *After the Arab Uprisings: Progress and Stagn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by Shamiran Mako and Valentine M. Moghadam
- *Diaspora as Translation and Decolonisation* by Ipek Demir
- *Refuge beyond Reach: How Rich Democracies Repel Asylum Seekers* by David Scott FitzGerald

> 還有更多

研究委員會對本次大會的主題有自己的理解並以不同的取徑選擇了論文。此外，我們還有由澳大利亞當地組織委員會所組織的四場精彩的澳大利亞專題會議，是關於如下引人注目的主題：難民、氣候變遷、土著獎學金以及澳大利亞的當代不平等課題。當然，在該計劃中還有綜合會議以及不同國家、區域、語言和專題協會的會議，並臨時會議和專業發展會議。在大會之前，我們還由不同的研究委員會以及澳大利亞社會學協會（我們當地的主辦方）組織了一些會前活動。我在此要特別強調為 ISA 全球青年社會學家競賽的獲勝者和決賽入圍者所舉行的研討會，這將會帶來來自14個國家的15名青年社會學家。

不必多說，墨爾本是個見面的好地方：它是一個充滿活力和友善的城市，擁有公共藝術、許多公園和美味食物並有一些經濟适用房。我盼望在2023年的六月底見到你們！■

來信寄至：

Sari Hanafi

<sh41@aub.edu.lb>

Twitter: @hanafi1962

> 后疫情时代：重燃对于实体会议的信心

Anahí Viladrich, Th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CUNY), 美国



来源: Unsplash。

2022年8月，我飞往洛杉矶参加第117届美国社会学年会。此次开会，是我两年以来第一次亲身参与的会议。虽然我非常兴奋能与同事们重聚，但心中仍然害怕与其他人有过于近距离的接触。对于这场连续四天，且参与者有4500多人的实体会议，我非常担忧自己可能再次染上疫情。即使我已接种疫苗，甚至曾感染过两次疫情，但对于是否要与数千名同事共处一室的这个决定，我仍犹豫了很久——即便我知道多数人都会戴着口罩参加会议。

在权衡各项选择之际，我反思了线上会议和实体开会的利弊，并决定从事社会科学家似乎最擅长的工作，也就是研究他们两者各自的优势与劣势。在这篇文章中，我回顾了我的所学，以及我如何在后疫情时代，将面对面会议经验更加优化的分享。

> 循环绕圈

疫情刚爆发时，Zoom 的使用，被认为是使我们在[知识与网路获取方面会更加大众、普遍化](#)的机会。

而接下来两年半的期间，线上会议被证明是最便宜也最容易的开会方式——无论是在自己的居家办公室，甚至是卧室；我们都能让学术和职业团体共聚。这种网路发展，让我们可以从任何地方参与异地的活动，也就表示我们留下[较少的碳足迹](#)，从而有助缓解气候变迁。在疫情前，我们必须花上大量时间参加这些举办在遥远地点的会议。而且在开会前，为了确保注册、机票和食宿的费用无误，我们总免不了耗费许多时间与大学行政部门进行交涉。

2020年3月，大家开始频繁使用线上会议后，原先那些繁琐的事前准备几乎都消失了。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长期面对萤幕的我们，变得[越来越疲惫](#)。更不用说，在开会时那些时不时可能出现的令人尴尬的瞬间，更令人心力交瘁（如：设备技术问题、麦克风故障，还有最常见的问题，也就是巨大的厕所冲水声与孩子们的哭闹声）。另外，[充分利用线上会议](#)，也表示我们将可能花较少的时间参加同事的演讲和分组会议。老实说，许多机构希望他们的教职员在参加线上会议的同时，也能继续完成他们的日常工作。

>>

最初，我对参与今年的ASA会议感到犹豫不决。对于参加一个潜在的超级传播者可能出现的活动，我真的感到非常恐惧；这样的惧怕，甚至抹灭了原先我对于[面对面学术交流](#)的强烈欲望。不过，幸好许多[建议和文献](#)都帮助了我减缓忧虑，以下是我整理出的建议，以及针对此事的总结。

1. 疫情的安全指导方针与了解会议进行的预期情况：就如目前多数专业组织举办的现场活动，ASA将每个人的安全摆在第一顺位，[疫情的协议](#)内容也会贯彻整场会议。会议的组织和与会者之间的会前沟通，不仅阐明整场会议维持安全的策略，也是帮助演讲者调整他们对会议期望的关键。到会场前，我们需事上传我们的疫苗接种卡；而在抵达会场时，现场工作人员也会协助检查每个人的疫苗接种卡，确保人人都已接种过疫苗。也就是整场会议表明了：没有接种过疫苗或没有佩戴口罩者，无法进入会场。

2. 保护他人的责任感和荣誉准则：虽然无法完全排除可能感染和传播病毒的风险，但我们透过宣导保护彼此的观念，试图减少人们暴露在染疫高风险情况的机会。因此，即使是在发表论文时，我们仍需与他人保持安全距离，且在室内须全程佩戴口罩（除了吃饭或喝水，才能暂时脱下口罩）。感谢洛杉矶美丽的夏季天候，许多活动都在户外举行，因此我们有足够的空间进行交流。

3. 场域的升级：这次会议的进行过程，许多人都经历了一种共同的「怪异感」——虽然感激有机会能与他人接触，但在衡量与其他同事的安全距离时，许多人都对此产生不确定性与疑虑。因为，自己如何防疫和每个人希望与他人保持的安全距离有多少这件事，都会因人而异；因此，也会令人特别难以拿捏与他人的身体距离。更重要的是，许多人因为久未当面与他人社交，因此在閒聊时，可以看出他们对于这件事已经略显生疏。在ASA会议期间，一些年轻和资历较浅的同事告诉我，「破冰」这件事，对他们来说并非如此轻松容易。就像其他技能一样，擅长与习惯社交是必须练习的。这对于那些因疫情而失去亲人，或持续患病而受到创伤的人来说尤其重要。因为对他们来说，室内空间可能已成为一个病毒的游乐场。

幸运地，会议名牌只包括与会者的名字和姓氏，并没有透露关于个人工作机构或专业领域的其他资料。此措施有助于避免对身份、级别和大学隶属关系的成见，从而促进与会者之间的自发交流。此外，大多数人都经历了一种隔靴搔痒的痛苦，也就是我们

想与同龄的人互动、分享趣闻，閒聊各自如何在这场疫情中调适身心灵。但，原本现实生活中习以为常地交谈和相互握手的互动方式，在这场疫情后皆不再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最终，这些各种各样的疫情故事，成为了一种特殊、能串连起我们彼此的共同点。

4. 重新现身于现实生活：任何虚拟平台都无法真正取代现实生活中与他人的关系，也就是在社会学术语中，我们所说的「社会资本」。现场会议的「閒聊」，可已被比拟为一种迅速的约会关系：比方说，你在排队喝咖啡时碰到了系主任、编辑或资历年轻的同事，那有可能这一次的閒聊，就成为你获得新工作或书籍合约的入场捲。或者，你也可能会与某人擦出火花，因此找到[你生命中的爱人](#)。更别谈聆听同事的演讲，可以使你更了解相关的计划。这些都可能激发你新的想法或提高你的学术水平；并使你在茶点的休息时间或会议进行时，拥有更丰富学术交流。

> 未來之路

我差点与今年 ASA 的实体会议擦身而过。现在回想起来，我很高兴自己没有放弃这次能实际现身会议的机会。对我而言，参与会议的意义[远大于单纯的学术交流](#)；虽然这是老生常谈的一句话，但在此时，我更能深刻地体会到此事。然而，尽管面对面的活动对[专业组织的生存](#)是至关重要，但它们仍然反映了在疫情之前就普遍存在的结构性不平等。其中包括我所说的「五星级饭店的会议模式」，这种模式有利于那些拥有机构资源（也就是：有钱）的人；不利于条件较差的大学、少数民族和研究生。幸运的是，许多专业组织，包括 ASA，都事先呼吁希望使所有人都能参加现场活动，包括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参与者。

未来会发生什么事，都将是未知。不管疫情的情况如何，可以肯定的是——串流媒体与（同步和异步的）线上活动，都将延续于我们的生活中。同时，我也已经迫不及待地想参与下一次的现场活动。「此时此地」，希望我能鼓励各位成为一位更好的自己：既致力于学术，又富有同理心。■

來信寄至：

Anahí Viladrich

<Anahi.Viladrich@qc.cuny.edu>

Twitter: @prof_anahi

> 全球社会学作为一种崭新的全球对话

Geoffrey Pleyers, Université Catholique de Louvain, 比利时, 国际社会学协会研究副主席(2018-23)



相片拼贴: Arbu, 2023。

在1990年代社会学的全盛期后,全球社会学受到了各种研究方法的严厉批评,包括底层、后殖民、解殖、女性主义和性别研究、南方理论以及其他「南方认识论」的研究。除了议题上的异质性外,其研究方法一致聚焦于挑战全球社会学的正当性;因为全球社会学被认为受欧洲中心主义和北方/西方社会学家的论述所支配。

上述批判理论所提出的认识论议程结合了两个步骤。首先,我们需解构固有的欧洲中心主义,正如 Sujata Patel 所论述的,全球社会学和我们学科的多数认知框架都紮根于此。而这样的观点,等同对西方主导的知识生产和传播,以及欧洲中心主义的世界观都提出了挑战。Enrique Dussel 表明,殖民主义和对美洲大陆的佔领,并非现代性的一个附带问题,而是一个核心且基本的问题。因为现代性即是仰赖殖民主义而建立,并且它更以此不断重复再制这样的模式。西方的主体性是在对「他者」的支配关系中构建了自己。因此,当代社会科学的一项基本任务,即是要分析建立、维持、重现和更新这些社会行动者、机制和机构的社会形式,以及也须认知到是原有的知识体系是如

何受西方主导的论述所支配。这就包括了,在再制社会结构和认识论体系中,对于他们自己过去和现在角色的反思性分析。

第二步,关注那些在现代化进程中被「隐形化」和否定的世界观、经验与知识,并使他们可见。原住民、生态、女权、农民和少数族群的运动,都已将此作为解放性抗争的重要部分;这也是在针对全球北方和南方研究的社会学家们,需迫切执行的其中一项任务。对于专业社会学者来说,此进程最重要的部分包括:看见长期以来被忽视的研究者、行动者、作者和学者,正视他们对此学科的贡献。

> 社会和认知抗争

这种批判性观点是源自于社会学学术场域的边缘。在拉丁美洲「解殖主义观点」的兴起,就是一个最明显可见的例子:它说明社会科学中最重要的辩论是源自社会运动,特别是原住民的抗争运动,而这样的思想随后才逐渐渗透到学术界。过去的三十年,来自全球南方和来自「受压迫阶层」(特别是女性主义者和

少数族群)的批判者、社会运动和学者,深刻地改变了我们看待世界、现代性、公平和「进步」的方式。全球南方的小农、原住民和社会运动者发展的观点,如生态女性主义和「美好生活」(如:来自厄瓜多尔的 Sumak Kawsay)等观点,皆深深影响我们看待生态、(我们所属的)自然和自身的方式。并且,类似的观点进程也发生在全球北方。「交织性」的概念即源于女性主义和黑人运动的抗争中;此论述是透过 Crenshaw 的书写被看见的。重要的是 Crenshaw 并非社会学者,他以社会运动参与者和律师的身分来说明和阐述这观点。由此可见,如今我们许多关键概念都源于底层的社会运动。

放下原本全球北方对于事物的认识论,以开放的心态向全球南方立场学习,如此一来,我们会看见社会行为者是如何作为知识的生产者,包括他们的如何去实践知识的理论视角、观点,他们的认识论和世界观(「宇宙观」)等,这些都将更清晰可见。事实上,原住民、农民或女权运动,皆一致认同替非传统的世界观进行抗争,是实践社会正义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厄瓜多尔原住民组织的领导人 Luis Macas 曾说:「我们的抗正是政治性和认知性的」。Boaventura de Sousa Santos 断言「没有实践认识论的正义,就不会有社会正义」,他认为应将这些抗争的讨论移至学术领域,并为「认知霸权」而努力抗争。

学者之间对于认识论争论的藩篱已被打破。这些「社会和认识论的抗争」不仅是我们的研究对象,而且渗透了整个学科。认识论和社会学是解放计划战场的一部分,因此也部分被它们改变了。

> 全球社会学仍有其正当性吗?

在这波强烈的批评后,全球社会学是否仍具有其正当性?或者说「全球社会学」是否与欧洲中心主义(殖民主义、父权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世界观有其内在的关联性?社会学是否应该放弃这个论述,以公正地对待植根于地方经验、抗争和特定文化的知识?我们是否应该专注于重建社会学的地域性和国家的历史,以正视那些长期被忽视的国家和地区作者、学者的贡献?

「解殖主义的转向」使西方社会学者放弃快速将研究成果、概念和解放视野普遍化的习惯。它要求我们承认植根于欧洲中心主义社会学中具支配性的认识论,并承认来自世界不同地区和受压迫背景的学者和社会运动者,对学科的历史和相关的重大理论贡献。甚至,它要求我们修改学科的典籍,更新「全球社会学」的观点;因为,长久以来「全球社会学」的观

点,就只是西方社会学的观点罢了(实际上只是西方社会学讨论中的一部分)。然而,解殖主义的转向并没有使全球社会学被全盘屏弃。墨西哥原住民的 Zapatista 社会运动表明:可以容纳更多不同世界观的世界,并不意味着需放弃任何全球视角。

在解殖主义转向后(并透过这种转向)重建的全球社会学,若要清楚地了解对于欧洲中心主义的批评以及看见非传统的知识,就必须辅以第三个不可或缺的步骤:[跨文化对话](#)。「跨文化对话」要求研究者看见自己的立场,并愿意向他人学习。这种姿态既是社会学的、文化的,也是个人的。它应该植根于一种愿意承担风险的意愿,也就是打破原有的确定性(和希望),并从与他人的接触中重新学习对于世界的认知。在这些前提下,社会学也就成为了一个集体项目;社会学聚集研究者的反身性,共同寻求对这个世界以及行动者更好的理解。

若是没有这种开放的、跨文化的全球对话,批判立场和理论的更新就会有三种风险:第一、分裂,第二、孤立(对于在边陲的社会运动者和批判学者的沟通、接触困难),第三、将西方社会科学和其知识的支配性,和南方社会科学和其知识的解放性两者同质化。为了更新全球社会学并恢复其适当性,我们需要将欧洲的根源和贡献「地方化」。正如 Chakrabarty 所解释的,这并不表示全盘屏弃西方对社会学和批判理论的贡献,而是将其视为更全面化的全球社会学的一部分,且此社会学领域是根基在建立地方性的概念和建构之上。

在 Achille Mbembe 的代表作《Critique of Black Reason》中发表了基进且非常具说服性的批评。在书中,他分析现代性以及当代现象中的殖民性,且在该书的后记中注记「我们只有一个世界」。他坚持世界各地的人们皆是相互联系的,我们需要发展一种新的世界性视角:「我们是共享这个世界的,而且这个事实无法被否认,[.....]对差异的宣扬只是另一更大的愿景中的一小部分——我们正朝向对于这样一个世界的愿景,也就是一个摆脱了种族、怨恨的负担,以及抛开那些被种族主义的所召唤的报复欲望。我们所期待的就是这样的一种世界。」解殖民的历史旨在重建一个共同的历史,而不仅仅是被殖民的人民的人民的历史。同样,我们的目标是重构一个共同的社会学,与来自全球南方、被边缘化立场的社会学者和社会运动者一起。这不仅仅是为了他们,更是为我们所有人。

因此,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巨大挑战,即是逐步形成一种行星思维。如果社会学能完成此任务,就能为这个观点做出贡献。要完成这点,全球社会学既不

>>

能继续紮根于西方大学和其典籍；因为这些典籍将自身的观点视为说普世的价值，另外，我们也不能局限于对西方社会学的批判。它需要像 Gurminder Bhambra 提议的，联系各种不同的社会学观点，并从此重构一种共同的社会学，这种社会学是多元化的，但仍建立在透过全球对话所产生的共同基础上。

> 国际社会学协会作为更新全球社会学的工具

ISA近几十年来的主要任务之一，即是透过更好的研究方法将研究、认识论以及来自全球南部和拥有受压迫背景的学者充分纳入普世的社会学，并以此建立与更新全球社会学的论述。

国际社会学协会建立在这样的信念上：借Sari Hanafi 和 Chin-Chun Yi 的话说，他们认为来自不同地区的社会学家之间的公开对话是「解决全球重大社会学问题的关键」。Sari Hanafi 和 Chin-Chun Yi 将国际社会学协会第四次国家协会会议的贡献收集在《[Sociologies in Dialogue](#)》一书中。ISA研究委员会成立了一个任务小组，目的是为共享好的实践方法，并提出具体建议，促进ISA及其研究委员会内部的公平、多样性和包容性。向来自全球南方的作者提供更开放的环境，一直是ISA期刊和协会书籍的共同使命。宣传不同地区的社会学观点，并促进其交织、对话，是ISA杂志全球对话存在的理由。ISA的社交媒体有助于分享来自不同地区的资讯、分析结果和观点。然而，即使我们存在于线上开会非常普遍的时代，但人与人面对面的接触，仍然是促进彼此关系的最佳环境，也可以为加深对于彼此立场、争论和文化差异的理解。这就是为何全球性的会议和社会学论坛仍然是非常重要的活动；也是为何研究委员会同时使用线上会议以及实体会议的原因。我们的挑战，仍然希望替学者们是建立一个更具包容性和多样性的讨论空间，以此促进对于全球社会学的更新。为此，我们需要使全球社会学和进入国际舞台的对话机会普遍、民主化，同时也须保持植根于人们面对面交流，这种社会连带的重要性。

承认、「使其可见」和学习来自全球南部和受边缘化背景的研究者和行动者的社会学，不仅是透过满足多样性标准和确保知识传播的公平性，来使社会学更加民主。这也是对于拥有更丰富的资讯，以及更具适当性的社会学的探索，以此，可以为社会面临的挑战，提供更复杂和多方面的分析。巴西教育家 Paolo Freire 表示，被压迫者的观点和分析，可以提供对于他们现实和社会更好的理解。在疫情间，女性主义学者和社会运动者的贡献，表明他们有能力改善对我们的世界的认知，他们提出的那些具挑战性的观点远远超出女性主义和性别平等的范畴。来自全球南部的社会学者的分析和理论贡献，也同样有助于我们理解该地区的现实和挑战；以及身在全球北方的生活和社会之中，如何达成更具「普遍性」的理解。南方的认识论与女权主义、生态学、原住民和具交织性的研究方法，不仅仅是21世纪社会学的另类选择，更是全球社会学的核心；因为这些论述已深刻地改变了我们的学科。■

來信寄至：

Geoffrey Pleyers

<Geoffrey.Pleyers@uclouvain.be>

Twitter: @GeoffreyPleyers

> 为什么我们需要新的架构 研究全球南方的极右派

Rosana Pinheiro-Machado, University College Dublin, 爱尔兰; Tatiana Vargas-Maia, Federal University of Rio Grande do Sul, 巴西



巴西艺术家和政治学家 Ribs (https://twitter.com/o_ribs 和 <https://www.instagram.com/o.ribs/>) 为社会理论和拉丁美洲研究核心的社会运动观察站 (NETSAL-IESP/UERJ) 所作的插图。
来源: Ribs, 2021。

大量的研究试图解释2010年后极右派的兴起与复甦。本篇短文中,我们将透过以殖民主义为分析核心(Masood和Nisar, 2020; Tavares Furtado 和 Eklundh, 2022)的全球南方视角¹论证此现象。国际文献经常将全球南方视作更广泛的政治活动范例、个案或变体进行以欧美国家为核心的分析。这般殖民化的学术思维,让巴西和菲律宾等国家都经历并重塑世界上最激进和暴力的独裁主义。Jair Bolsonaro 执政时期对环境造成难以估计的迫害,却只引起少数国际学术单位和记者注意,因此阻碍了人们了解极端份子对世界造成的严峻伤害。

回应近期民粹主义和极权主义的研究中,并没有明确指出南北方国家的区别,皆主要分析欧美国家的政党与政治行动(如: Brown、Gordon 和 Pensky, 2018; Eatwell 和 Goodwin, 2018; Hawley, 2017; Hermansson、Lawrence、Mulhall 和 Murdoch, 2020; Inglehart 和 Norris, 2016 以及 Mondon 和 Winter, 2020; Mudde, 2017; Mudde 2019; Mudde 和 Kaltwasser, 2018)。这使研究结果有限但普遍一致,都将重点着重在解释富裕国家的衰退、福利国家的溃堤、移民问题、劳工阶级的贫穷与不满、去民主化和针对自由民主的反抗。

>>

> 当代极右派的背景

我们必须先探究极右派(再次)出现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背景;在这方面,这将对一些新兴经济体的考察具有启发性的作用。当 Narendra Modi (印度,2014年)、Rodrigo Duterte (菲律宾,2016年)和 Jair Bolsonaro (巴西,2018年)掌握权力后,他们的国家并没有在过去任何形式的福利国家中崩溃:穷人摆脱贫穷和极权主义早已不再新奇;相反的,它蕴含着巨大的希望。这段期间,印度和菲律宾持续维持高度经济发展;尽管在巴西选出 Bolsonaro 后出现经济衰退,极右派的复甦仍随着经济成长的高峰到来(Rocha,2018年)。这些国家并不需要面对因为移民与当地居民抢工作所造成的难民危机;相反,他们正面对族群化的「内部敌人」。

在以持续的独裁主义、保守主义、不稳定性高和殖民化为特征的全球非核心地区,极右派再现的现象不应该使用以「欧洲—美国—西方国家」为脉络的架构进行解释。在一篇充满洞见、关于反殖民主义的批判学术论述中,Masood 和 Nisar (2020)建议针对极右民粹主义的全面分析必须考虑到这些运动在全球北方和南方的异质性。但这并不代表我们认为全球北方的经验应该被忽略,2008年的经济大萧条、2016年的英国脱欧公投、美国川普当选总统都是让独裁主义渲染全球,并提供这些行动背后动机和机会的重要事件。全球北方国家利用自己较高的权力,不断灌输极端主义的意识形态给全球南方。除此之外,社群软体、全球化的经济模式、跨国权力网路和阴谋论也都是让独裁主义迈向全球的因素。

> 新极右派的学术研究:比较和全球议程

虽然关于全球南方威权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研究有着悠久的传统,但有关新极右派的文献却迟迟没有将巴西、印度等国家纳入同一的分析现象中。2017年由Cas Mudde 编辑的《The Populist Radical Right: A Reader》一书应是地区性的论述,因为它主要关注欧洲地区,却被视作全球性的研究结果。Bolsonaro 执政带来的影响吸引了全球的关注;然而,这一过程的认识论取径似乎被学术界持续存在的殖民化知识生产所主导。现在巴西已被一些研究纳入全球极右派中全球南方代表的案例,并且使用同样的方式进行分析。我们同意 Masood 和 Nisar (2020)的看法,研究取径应该被翻转:全球目前兴起的现象的部分因素正是从全球南方未完成或混合的现代性而来。

尽管有大量的文献资料分析引起全球南方再次兴起民粹主义的原因和社会现况,对于此现象的了

解仍因为缺乏探讨为什么几个新兴国家会再次迎向威权政治的框架而显得狭隘且零散。透过聚焦在南方的经验,我们应该重新校准社会对于被殖民国家经验的理解,并且拓展概念范围和限制(而不是否认它们)。在一个崭新的研究议程中,我们应该问:新极右派的「新」代表的是什么?Bolsonaro 或 Duterte 所引导的威权民粹主义和过去的独裁政权之间的异同为何?北方国家可以从长期以极端政治表现为标志的国家中学到什么教训?这些新型态的极端主义、新法西斯主义和独裁主义在不稳定的社会下与残酷的新自由主义理性相互结合,并在二十一世纪透过新科技助长民粹主义,并使其成为主流。

或许南北方极右派最主要的差异是它的强度与规模;然而,正因为这般区别,才必须在历史的特殊性中加以理解和归纳。例如,川普和 Bolsonaro 可能会在相同的社群媒体上发表大同小异且令人难以忍受的说词,并同样使用狗哨政治策略;然而,由其引发的仇恨态度会根据各国不同程度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民主性而出现彻底的不同。大多学者在分析各地民粹主义之间的相同之处时便已耗费大多的心力,但同样需要关注的是,比起北方国家,南方国家更严重和危险的针对性别和性权利的讨伐。

> 全球南方的特点

下列是说明全球南方部分特殊性的新架构,由五个面向组成:

- 1.经济衰退和政治主体性:极右派的文献着重在以贫穷、怨天尤人为形象的白人男性上;相比之下,全球南方的殖民国家总以战争多、经济衰弱的样貌呈现。然而,新兴国家推动经济复甦也同样是促进新型政治参与的主体。回顾辉煌往日固然是了解北方国家的新法西斯主义主体性的基础,但若应用要在南方国家,此一范畴需要被重新思考。
- 2.民族主义和仇外心理的细微差距:民族主义在殖民国家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诚如上面所述,部分全球南方国家并没有辉煌的过去可以颂扬,只有未来可以预见。比起外来者(移民或难民),这些国家更有可能出现内部敌人(少数族群)。即使种族主义是极右派研究的核心,但举例来说英国的白人至上主义和印度教至上主义的意义便有所不同。
- 3.独裁统治和铁腕人物的遗毒:许多南方国家都在承受血腥独裁政治后带来的后过,造成政府和军方面对少数种族时长期的暴力倾向,也使这些族群从来没有经历过各种民主形式。

4. 非世俗民主中的宗教性和道德保守主义：现世主义是建立民主的核心要旨，然而全球南方在建立新民主时正面临宗教对政治事务的干扰和原教旨主义的负面影响，后者作为一种纪律模式，控制着身体和性。

5. 反抗：极右派再次出现在全球南方，并且持续进行着。然而，其中几个对抗极右派的重要应对方式和富有创意的回复来自拉丁美洲国家的女性社会运动，像是阿根廷和智利。

最后，这五个面向并不一定佔决定性的因素，也不适用于所有情况。这些建议可能揭示了全球南方国家日常威权主义展现的共同特征。为了更近一步了解极右派在全球南方出现的起因和造成的后果，我们相信需要进行更多的比较研究。这方面的钻研有可能改变我们对当代世界的政治现象的理解。■

來信寄至：

Rosana Pinheiro-Machado

<rosana.pinheiro-machado@ucd.ie>

Twitter: @_pinheira

Tatiana Vargas-Maia

<vargas.maia@ufrgs.br>

Twitter: @estocastica

注1. 详见 Pinheiro-Machado 和 Vargas-Maia 2018年的文章，它也是我们出版于2023年的书籍的改写版本。

參考資料：

Brown, W., Gordon, P. E., and Pensky, M. (2018) *Authoritarianism: three inquiries in critical the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Eatwell, R., and Goodwin, M. (2018) *National populism: The revolt against liberal democracy*. Penguin UK.

Hawley, G. (2017) *Making sense of the alt-righ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Hermansson, P., Lawrence, D., Mulhall, J., and Murdoch, S. (2020) *The International Alt-right: Fascism for the 21st century?*. London, Routledge.

Inglehart, R. F., and Norris, P. (2016) Trump, Brexit, and the rise of populism: Economic have-nots and cultural backlash. *Harvard JFK School of Government Faculty Working Papers Series*. 1-52.

Masood, A., and Nisar, M. A. (2020) Speaking out: A post-colonial critique of the academic discourse on far-right populism. *Organization*. 27(1), 162-173.

Mondon, A., and Winter, A. (2020) *Reactionary democracy: How racism and the populist far right became mainstream*. London, Verso Books.

Mudde, C. (2017) *The populist radical right: A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Mudde, C. (2019) *The far right today*. John Wiley & Sons.

Mudde, C., and Rovira Kaltwasser, C. (2018) Studying populism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Reflections on the contemporary and future research agenda.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51(13), 1667-1693.

Pinheiro-Machado, R. Vargas-Maia, T. (2018) As Múltiplas faces do conservadorismo brasileiro. *Revista Cult*. 234, 26-31.

Pinheiro-Machado, R. Vargas-Maia, T. (2023). *The Rise of the Radical Right in the Global South*. London: Routledge.

Rocha, C. (2018) “Menos Marx, mais Mises”: uma gênese da nova direita brasileira (2006-2018). Doctoral dissertation, São Paulo, Universidade de São Paulo.

Tavares Furtado, H., and Eklundh, E. (2022). Populism or the European condition?.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Radicalism*. 16(2).

> 绿色协定与生态社会转型的地理政治学

Maristella Svampa, Universidad Nacional de La Plata, 阿根廷。 **Alberto Acosta**, 经济学家、厄瓜多尔制宪会议前主席。 **Enrique Viale**, 环境律师, 阿根廷。 **Breno Bringel**, State University of Rio de Janeiro, 巴西, 以及 Universidad Complutense de Madrid, 西班牙。 **Miriam Lang**, Universidad Andina Simón Bolívar, 厄瓜多尔。 **Raphael Hoetmer**, 策略与行动之设计、研究、组织变迁专家, 秘鲁。 **Carmen Aliaga**, 社会环境行动协调组织, 玻利维亚。 **Liliana Buitrago**, 生态政治观察站, 委内瑞拉。



Pacto EcoSocial eIntercultural del SUR

来源: Pacto EcoSocial e Intercultural del Sur。

2020年初, 疫情刚发生之后, [南方生态社会与文化公约](#)成立。其目标是推动拉丁美洲由下而上的生态社会转型运动; 并寻求促进、推广、系统化与以下各种抗争主题相关的在地经验, 包括: 社群控制、领土自治、粮食主权、农业生态学、社群能源和生态女性主义等。

此项倡议的动机, 是为了应对当代世界正经历的不同危机, 同时也是为了能在拉丁美洲, 提供近年出现的生态社会转型和绿色协约替代方案。我们深

>>

知,与各大洲通过各种在地经验所发起的环境协定倡议相比,那些带有霸权色彩的环境协定并不能真正地解决问题,其最终只会导致现状被复制,让如今的地缘政治/南北不平等变得更加严重。

两年多过去,全球局势更加恶化。如今的我们面临战争——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导致能源与粮食危机更加剧,气候危机也变得更严重。此外,战争更促使具有霸权主义色彩的绿色转型剥削主义更加茁壮。

这篇文章将分析三个面向。首先,是霸权主义绿色协定的一些关键特征,以及我们对其的批判。接下来,我们将从生态债务的角度出发,讨论生态社会转型的地理政治学。最后,我们会列出促进正义转型的建议和挑战,并勾勒出完整的生态社会正义前景。

> 霸权主义绿色协定下的南方生态社会、跨文化协定

面对生态与[系统崩毁](#),世界各地的许多企业与政治机构已经开始将能源转型作为目标。他们大部分都认知到应该要减少碳排放量,但却没有质疑当前资本主义之下的社会代谢。这类「转型」论述和计划,经常是以企业主义、技术官僚、新殖民主义甚至是剥削主义为基础,而忽略了结构转变。从南方生态社会与文化公约的观点来说,我们应该去质疑这些方法,并将全球正义逻辑作为生态社会转型的根基——这既是对霸权主义转型的批判,也是替代。

近年来,绿色协议和绿色新政提案层出不穷。纵然有各式各样多元的提案,但简单来说,这些提案为全球北方提供了一套政治/辩证叙事,以如何减少碳排放、促进「公平」与所谓的「永续」经济增长为主题。气候正义往往是这些绿色公约的核心,有些还特别为层遭受负面环境影响的社群设立「补助基金」。但很多时候,气候正义无法触及真正的问题。在急于将能源使用转型成可再生能源的过程中,全球北方很少考虑这种转型对全球南方的影响。这种情况甚至会出现在各种政治左派提出的方案中,这些被称为「[绿色新政](#)」以致敬罗斯福的提案,其内容常由国家干预社会政策、经济监管、创造就业机会的角度出发,于此同时,其他绿色协定则为企业/市场导向的转型创造更多空间。

全球北方的所有绿色协定都认为气候变迁是个紧迫的问题,也认为将经济正义与去除碳排放结合有其必要。毫无疑问地,相较于发展主义的盲目与否认,这也算是一种进步了。但是,即使至今以来野心最大的政府计划——欧洲绿色协定,也没有提出完整的经济转型方案,甚至受到当地关键行动者的质疑。另一边是美国的 Green New Deals (GND),这

项协定以国会决议的形式是没有法律基础、不具约束力的,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只能说是展望。虽然GND是拜登竞选纲领的一部分,但美国政府一转头,就为近海石油的开发准备好了数百万公顷的土地。中国方面,虽然在最新的五年计划中有一些绿色表态,但它仍是世界上二氧化碳排放量最高的国家,且大量地使用煤炭。

许多绿色协定把生态社会转型理解为市场导向的能源转型。在全球北方和南方,佔据支配地位的愿景是企业转型。我们可以将这种转型视为一种模式的延续,其具有与化石燃料制度相同的资源集中与商业逻辑,并延续了领土干预的垂直特性,是典型的掠夺性剥削主义。

锂三角(阿根廷和智利北部,以及玻利维亚南部)即是这种企业转型的案例,我们可以在当地看见剥削主义的重组,即为满足北方需求而进行的绿色转型,例如为电动车供应电池。另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厄瓜多尔亚马逊河流域的森林砍伐后大量出口,并供给中国建造风力涡轮机叶片。

我们必须批判并分析这类以北方「绿色」能源转型为名的新剥削主义。在这些霸权主义绿色协定论述中的「转型」,指的仅是能源矩阵的多样化。即使是最友善、最关注社会正义与环境正义如何结合的北方绿色协定,「正义转型」的实行也往往局限于国内,而没有考虑其将如何影响全球南方。

这些协定缺乏能源分散化、非集中化以及改变生产方式等手段,反而促进了一种具有资本主义积累逻辑,且仍然以无限增长为信念的生态转型模式。由于这种模式必须使剥削和破坏生态的情况更加严重,因此,于生态代谢意义上非永续的化石燃料模型仍然得以存续。

我们的信念与这些模式相反。我们建议,应该从南方角度来思考正义转型,才可以避免南方继续被北方定义、重新殖民。我们也主张抛弃部门的概念,并建构出一个涉及更多领域、保有完整性的生态社会转型愿景。能源转型如果不解决能源资源分配的根本不平等、不促进非商品化和非殖民化、不加强公民社会和生活结构的复原力和再生能力,最终就只能部分地改革,而不能直接解决环境崩溃的结构原因。

> 生态债务与生态社会转型的地缘政治

[我们的提案](#)将生态社会转型的地缘政治至于核心。从长远来看,这意味着以拉丁美洲的历史殖民剥

>>

削模式——相比于全球北方的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为标志来解读南北关系、空间性与流动。从中期与短期来看，这是一个揭露国家与企业推行的「错误解决方案」，并认知到它们如何在多个领域进行破坏。

生态社会转型的地缘政治有几个面向，其一是全球不平等的加剧，这与从拉丁美洲开采原物料的加剧有关。此外，社区与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也直接地带来负面影响。世界自然基金会的资料显示，从1970年以来，物种灭绝的速度急遽增加，脊椎动物的族群规模在全球平均下降了68%，在拉丁美洲热带地区甚至下降了94%。这些都突显出生态债务的问题。虽然这源自于殖民掠夺，但由于生态上的不平等交换，与工业化国家的剥削性生活方式对平困国家环境的自然要求，这些情况一再恶化。

我们也必须考量到南方国家出口自然资源对环境、劳动者、和领土造成的压力。生态债务也以另一种相关联的方式增长，富裕国家会透过直接或间接地将污染物（废物或排放）转移到其他地区，或要求其他地区支付罚金（碳抵销）而不承担责任，来克服他们自己「国家」的生态系统的失衡。

生态债务同时也是气候债务，且全球南方和北方之间的历史排放量，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例如，欧洲和北美1750年以来的碳排放，佔了那段期间全球碳排放量超过60%，而南美只有3%。这一点不容忽视，就像我们不能在思考生态债务的解决办法时自我侷限在货币补偿里面。自然的商品化和随之而来的环境成本，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不平等的剥削系统，其影响的人是种族化、殖民化的。

我们提倡更完整的一套策略，借由对生态债务负责，以保证南方人民在整体、本体和补偿正义的意义上，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相比之下，霸权主义转型非但没有减少地缘政治的差距，反而有加深全球南方殖民和生态债务的风险。如果不将这些债务的赔偿考虑在内，任何气候正义和生态社会转型都是不可能的。这个涉及全球北方与南方的抗争与批判行动，超越了任何形式的二元论和化约主义，其既能将「到底谁欠了谁什么？」的论题推广至全球，也能为各地的生态领土抗争提供一套新的国际观。

> 在能源转型正义与整体正义的生态社会视野之间

在我们与全球南方其他现实的讨论中（参见我们最近的《南方人民生态社会能源转型宣言》），我们观察到一种趋势，增加海上石油开采、水力压裂法，甚至更多大型项目，是为了满足全球北方的过度消

费。集约化的单一工业形式的农业剥削主义正在侵佔所有的水、空气与土地资源。各国国家企业的控制程度高的令人忧虑。

虽然社会生态转型不能侷限于能源议题，但能源系统、生产方式与社会／自然关系的结构转型必不可少。就我们对能源转型的理解而言，《南方生态社会与文化公约》的主旨是：

- 能源是一种权利，能源民主是维持生命之网的必要条件。
- 必须将社会正义与环境正义结合，以消除能源贫困。生态社会正义意味着打破权力关系，这种关系优先考虑社会中的特权群体，排除了弱势群体、剥削女性化的身体与自然。
- 我们必须让我们的社会与经济去碳化：这在南方是个相对北方更大的挑战，这是剥削所留下的生态、历史与殖民足迹，也是因为原物料的储备集中于南方。
- 必须将我们的经济、社会与文化结构，与石化燃料、开发自然的任务、将拉丁美洲定位为无限的「黄金国度」的发展主义想像脱钩。
- 整个系统必须改变，而不仅是能量母体：去中心化、去私营化、去商品化、去父权化、去殖民化、修复与治愈。
- 我们必须转变生产方式，转变我们的社会关系矩阵和我们与自然的关系。
- 能源需要以一种「关系」的方式看待，所以我们必须表现出我们对能源的相互依赖与生态依赖。
- 重要的是要警惕「错误的解决方式」，例如，对可再生能源、锂、和其他转型矿物的限制和双重标准。这包括与企业与国家在缔结国会议（COP）等领域达成共识的关键观点，这些共识旨在实施为南方考量具有争议的能源模型，如绿色、灰色、或蓝色氢、智能农业、碳市场、地球工程，与其他会维持当前全球北方与全球南方之间的权力关系与能源不对等的项目。
- 石化燃料要被留在地下。
- 我们必须从区域或南方的角度，不只从货币方面，还要从结构与象征方面收回生态债务。
- 重要的是，我们要降低并减少社会代谢：用更少的物质与能源生产，减少消费——重新定义我们对幸福的理解，远离物质和金钱。

在这些策略外，还必须依据不同的现实情况提出具体的意见。这就是我们最近试着透过与 [CENSAT Agua Viva](#) 以及其他拉丁美洲组织一起推动的 [Disminución planeada de la dependencia fósil en Colombia](#) 在做的事，这是一个集体提案，旨在与哥伦比亚政府提出的，由 Gustavo Petro 与 Francia Márquez Mina 主导的能源转型提案进行对话。

《南方生态社会与文化公约》对我们的区域所进行的改革过程十分敏感，同时也意识到逆行与寡头势力的重要性，我们将持续前进，把抗议与建议、批评与发展的替代方案结合起来。我们将接受近几十年来在运动抗争中形成的思想与概念，并坚持守护这些信念：自然的权利、良好的生活、再分配正义、关怀、转型正义、自治、后剥削主义、生态领土女性主义、粮食主权与粮食自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捍卫一个完全不同的协议：不是寻常的肥猫间的协议与交易组成的霸权性的《绿色协定》，而是一份来自南方、为了南方、与地球的协议，正如Arturo Escobar在[介绍我们的倡议](#)中所提出的那样，一种对其他生活方式的承诺，以及与世界同在、生活在世界上的承诺。■

來信寄至：

Pacto Ecosocial del Sur

<pactoecosocialdelsur@gmail.com>

Twitter: @SvampaM / @AlbertoAcostaE /
@EnriqueViale/ @brenobringel / @lilib17 /
@ColectivoCasa / @PactoSur

> 为了百分之一的发展

Vandana Shiva · Navdanya 自然、科学与生态研究基金会，新德里，印度



小农实际上比大型工业化企业农场更有生产力，因为他们不会使用破坏环境的商业添加剂，如化肥、农药和基改种子。
插图：Arbu，2023。

我们不应停滞在「发展」论述和由资本主义父权思想塑造的国内生产毛额思维，而应重申我们作为地球公民的真实人性。正如 Lessem 和 Schieffer 在他们的著作《[Integral Economics](#)》中写道：如果提出资本主义概念的人们不是选择一位单身中产阶级男性作为理论架构中最小的经济单位而

是选择一名母亲的话，他们就无法用相同的方法得出人天生自私的公理。

资本主义父权制的经济型态在战争和暴力中被形塑——反对自然和多元文化的战争和针对女性的暴力。原先的目标是拥有和控制自然和人造的真正财富，然而，竞争市场的「逻辑」等虚构的经济概念有

逐渐取代实际物质的倾向。分离是父权主义和资本主义后出现的典型核心特质。首先是自然和人类的分离，再来是人与人之间基于性别、宗教、种姓制度和阶级的分离，这些把相互连结的事物进行分离的行为是暴力的根源——刚开始在脑中发酵，之后便存在在日常行为中。毫无意外，过去的社会不平等随着企业全球化的发展而发展出更残暴的型态。根据现下趋势便可以轻易地发现，全球前百分之一的人口所控制的财富将会与剩下的人口所持有的一样多。

现今，集团声称法人的人格优于实际人类的权利，但虚构事物与创造财富的实际来源之间的距离却更远了。资本成了金融的替代品，并以工具和技术使有钱人能够不做任何事，仅透过投资收益增加财富。在金融经济学中，赚钱的方法是立基在投机上，而放宽金融管制让有钱人使用别人辛苦赚取的钱财进行投机。政府和大众都将「成长」的概念作为成功的衡量标准，它涉及了一种发展形势和由其衍伸的危机：全球经验和由在资本父权主义中掌权的那群人所立下的典范，都只是为了让这群人能够拥有更多财富。

经济学原理忽略掉的是自然和社会中生命的破坏。生态 (Ecology) 和经济 (Economics) 二字皆源自于希腊文「oikos」，代表家的意思；生态和经济都指涉了一种家庭管理形式。当经济和自然科学背道而驰时，会导致地球，也就是我们的家，遭到错误的对待。

气候危机、水资源危机、生态多样性危机和食物危机都是没有妥善规划地球资源的征兆。因为人们没有意识到大自然作为「真正的资本」和一切事物的「资源」，而将地球维护得一塌糊涂，并破坏它的生态循环。在没有大自然和维持地球生命的生态过程，伟大的经济会崩溃、文明会消失。

在当代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模式下，贫穷来自于世界前百分之一的人口夺走了其余人的生存空间、资源和财富；我们可以从被迫移居的中东罗贾瓦地区和缅甸罗兴雅人身上清楚看见这样的状况。这群世界前百分之一的人们推动工业化农业，以昂贵的价格贩卖种子和农用化学品，不只使得农夫们变得越来越贫穷、陷入债务困境，同时也破坏了土地、水质、生态多样性和农夫们的自由。

我的书《[Earth Democracy](#)》讲述了孟山都公司如何透过炒作基改Bt棉花垄断棉花种子供应市场。为了购买昂贵的基因改造作物和所谓的绿色革命技术，许多农夫因此被迫负债，在过去二十年间有超过三十万的印度农夫自杀，而从事棉花产业者佔多数。为了对抗这般暴力的垄断，我成立了一个名为Navdanya 的乡村研究农场，保存下农夫们种植的多传统有机棉花，并在种子自由运动中发放。

如果农夫们变得更贫穷，一定是因为这个目前降至三人的毒枭集团——Monsanto、Bayer、Dow Dupont 和 Syngenta Chem China，让大家不得已购买昂贵的种子和农用化学品。从种子到农用化学品，再到国际贸易和速食制造加工产业，垂直整合型态的公司剥夺了农夫九成九的生产价值。农夫们因为自由贸易提倡倾销、破坏生计，并压低农作物价格而变得更贫穷。除此之外，小农其实比工业化农场更具有产值，即使没有使用对环境有害的肥料、农药、基改种子等添加剂。同时，全球农夫组织农民之路指出，传统的棉花生产方式不只给予农夫更多的自主权，更有可能减缓全球暖化的发生。

不言而喻，佔「经济成长」前百分之一的人们是反生命的，并且他们的行为也同样影响到全球北方的劳动人口。菲律宾的非政府组织 IBON International 表示，如果过去传统的男性暴力是用来使女性保持作为劳工和再生产工具的角色，那么现在的男性暴力便是为资本主义的盈利提升而服务。政府被那百分之一的人给掌握，并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核准下，于健康和教育、公共交通、能源等方面强行推对盈利私有化政策，因此使得各地的人都变得越来越贫穷。

劳工、农夫、家庭主妇和整个大自然都被佔宰制地位的资本父权主义经济模式视作「殖民地」。全球化下，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型融合了两种形式的暴力：过去的父权文化与现代货币法则的结合。■

來信寄至：

Vandana Shiva

<vandana@vandanashiva.com>

Twitter: @drvandanashiva

> 「Buen Vivir」： 系谱学和展望

Mónica Chuji，亚马逊基楚瓦族知识分子，前通信部长，厄瓜多尔；**Grimaldo Rengifo**，Proyecto Andino de Tecnologías Campesinas (PRATEC)，秘鲁；和 **Eduardo Gudynas**，Centro Latinoamericano de Ecología Social (CLAES)，乌拉圭



Luísa Acauan Lorentz 在巴西阿雷格里港农村地区一栋房子的外墙上绘制的壁画。

来源：Luísa Acauan Lorentz，2022年。

Buen vivir 或「良好生活(living well)」这个范畴阐释了从南美视野针对发展和其他组成现代性核心议题的激进批判，同时并提供能超越自身的另类观点。这与西方所理解的「良好状态(well-being)」或美好人生(good life)不大相同，更不能描述成意识形态或文化。其能被视为一在知识、情感与心灵上的深刻转变：即从认识论上敞开了理解人与非人之间的关系并不意味着社会与自然在现代产生的分裂，而其作为复数的范畴仍在构组的阶段，且在不同地方和区域间有着不同的形式，并同时混合原住民对现代性永恒批判的特质。关于 buen vivir 这个概念在二十世纪中期已被纪录，但其现代意义要等到1990年代才被明确地阐释。

对此概念贡献良多的有秘鲁的安地斯农业技术计划、玻利维亚的安地斯农业与畜牧业发展部中心与其他知识份子，还有厄瓜多尔的社会与原住民领袖 Alberto Acosta 大力支持。众多的社会运动支持这个理念，并在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带来政治的转变，且获得宪法承认。Buen vivir 也包含了不同社会、历史和生态的特殊情境，这来自于创新，以及来自原住民传统概念与现代性本身批判姿态的联系和混合。此一概念包括艾马拉人的 suma qamaña，玻利维亚瓜拉尼人的 ñande reko, sumak kawsay，厄瓜多尔盖丘亚人的 allin kawsay和秘鲁克丘亚人的allin kawsay。厄瓜多尔/秘鲁的shür waras和智利马普切人的küme morgen 是类似的概念。而西方所贡献的概念中则提供了对发展的激进批判，包括后发展主义、殖民权力与知识的承认、女性主义对父权的批判、承认非人类内在价值的另类伦理与环保视野如深层生态学。

因而，在这并没有单一概念，如厄瓜多尔的 sumak kawsay 和玻利维亚的 suma qamaña 两者是有所差异的。在前面的例子大致上翻译成西方范畴中指涉在社群中良好与和谐生活的技艺，也同时在社会与生态上进行定义。但，后者也指涉在特定地区的混合社群一起生活，所以如果说 buen vivir 排除了原住民的特性也不大对，更应该说这是回到了殖民前的条件；这些的贡献对概念的构建至关重要。

这里头也存在着超越了多元范畴的共同组成(Gudynas 2011)。所有这些概念都对单一普遍历史的概念和进程提出挑战，其为开放、多样、并行、非单一叙事和甚至循环的历史进程，并质疑其发展着迷于经济成长、消费主义与自然商品化等。这样的批评超越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不同发展，从这个观点来看，社会主义的 buen vivir 似乎没什么道理，因为这样的替代方案同时是后资本与后社会主义的，从脱离成长并聚焦在从紧缩政策的角度来完全满足人类的需求。Buen vivir 取代以人为中心且是唯一具有政治代表性主体与所有价值来源的观点。

同时这也敞开了道德上的论述(借由承认非人的内在价值和自然的权利),也敞开了政治的面向(承认非人的主体)。在面对父权体制上,即使是在农村和原住民领域的核心区域,也提出了女权主义的替代方案,以恢复妇女在保护社区和自然方面的关键作用。人文与自然在当代的裂解也被挑战:buen vivir 承认在特定的区域扩展其社群至人类与非人的动物、植物、山岳、灵体等。其中一个例子即是安地斯概念中的 ayllu :混合了根植于特定区域的社会生态群体。

Buen vivir 拒绝任何形式的殖民主义,并和多元文化保持一定的距离。相反地,其推崇重视各种传统知识间的跨文化性,从而在多民族的基础上去重新定义政治。buen vivir 也非常重视情感和灵性。在扩展社群中的关系上不限于市场交换或功利连结;相反地其结合了互惠、互补、共产和再分配等。

Buen vivir 背后也有着尖锐的批评。有人认为其简化了原住民知识的概念,而其他则人则认为实际上是新时代的发明。传统的左派知识份子坚信其分散了对真正目标的关注,真正的目标不是发展替代方案,而是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他们同时也不承认非人的内在价值。在这些论辩外,Buen vivir 却是在安地斯地区国家取得广泛且强有力的支持。于此,其也在拉丁美洲与世界迅速传播,为此提供了发展的特殊替代方案基础,如同在宪法上承认自然的权利和大地女神帕查玛玛;暂停在亚马逊地区的钻探;提供后开发主义转型的模型;基于非人类施为者也能参与的世界政治。

在这些 buen vivir 的原始观念和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政府发展政策间的激烈冲突中,促进大型采矿或亚马逊石油开采等开发主义做法的已经非常明显的例子。例如,「进步的」政权必须透过 buen vivir 的新定义来克服这些争端,无论是将其视为社会主义的厄瓜多尔或不可或缺的发展的玻利维亚,都必须将其置于现代性之中思考。这些立场已被许多国家机关、知识份子和非南美知识份子支持,而非南美知识份子

不管其意图为何仅仅只是在制定殖民的概念而已。除此之外,buen vivir 的原始概念已被保留,并持续促使社会对发展的抵抗;例如,在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和秘鲁的原住民和公民针对捍卫领土、水源和大自然的示威抗议。这些示威抗议的参与不仅限于少数知识分子和非政府组织,而且已经获得民众高度的支持。

总结来说,buen vivir 是一个现在进行式的刍议,由不同的运动和行动者支持,有其进步和倒退、创新和冲突的地方。其无法避免的仍在架构组织中,因为现代性是个难以超越的鸿沟。其必须是多元的,因为在这之中包含了质疑现代性的立场,同时开拓植根于特定历史、区域、文化和生态的思维、感受和存在一其他本体论一方式。然而,在这种多样性中有明显趋于一致地将其与现代性区分开来,如拒绝现代性对进步的价值,承认源于相关世界观的所扩展形成的社群,以及接受非人的内在伦理价值。■

在 Twitter 上追踪作者:
@Monicachuji / @PratecPRA / @EGudynas

> Ubuntu: 一种正义且赋权的概念, 及其生活方式

Lesley Le Grange · Stellenbosch University, 南非



马达加斯加, 猴面包树大道。
来源: Antoni Socias, Unsplash。

Ubuntu 是一个来自非洲南部的概念, 意指人性, 也暗指一种人类存在的条件或追求的状态。它关注于揭开人与人、人与非人世界的关系。换句话说, 人的发展是有赖于其他人类和宇宙。此外, ubuntu 认为人并不是西方传统下的原子化个体, 而是嵌入在社会和生物物理关系中。

因此, Ubuntu是「反人文主义」的, 因为它强调人的关系性存在和发展。Ubuntu源自非洲撒哈拉以南的数种语言中的谚语或格言。在南非使用的恩古尼语言(Nguni)中的祖鲁语(Zulu)、科萨语(Xhosa)和恩德贝勒语(Ndebele), ubuntu源于

Umuntungumuntungabanye Bantu, 指一个人的人性会在他与他人的关系中展现, 因此, 也是其人格特质的真实展现——「我们在, 故我在。」Botho 在索托-茨瓦纳语(Sotho-Tswana)中有相同的意思, 这个词源自谚语: Mothokemothokabathobabang。Ubuntu也是人类的核心元素。在祖鲁语中, umuntu是人类的意思, 而它由以下部分组成: umzimba(身体、形式、肉体)、umoya(呼吸、空气、生命)、umphefumela(影子、精神、灵魂)、amandla(活力、力量、能量)、inhliziyo(心脏、情感中心)、umqondo(头脑、大脑、智力)、ulwimi(语言、口说)和ubuntu(人性)。

>>

> 恢复一种传统的生活方式

然而，Ubuntu 不仅是一个语言上的概念，它也具有规范性的内涵，体现人们应该如何与他人建立连结——什么是人们对他人的道德义务。Ubuntu 主张人们的道德义务是关心他人，因为当他人受到伤害时，我们也会受到伤害。这种义务可以延伸到所有的生命，因为宇宙中的一切都是相关的：当我伤害自然时，我也会受到伤害。

就如同所有非洲文化的价值观，ubuntu 借由口语和传统文化的方式代代相传：其意涵交织在非洲人民的文化习俗和生活经历中。这种文化价值受到殖民化的侵蚀与抹煞。然而，在后殖民时代的非洲，ubuntu 及与其相同的概念被重新唤起，成为去殖民化方案的一部分；ubuntu 也得到越来越多国际上的关注，用来替代以发展为主流的观点，因为发展会威胁实践社会正义和环境永续的可能性。例如，有些南美洲的非裔群体正在运用 ubuntu 以更细致的解释 buen vivir。

> 一种正义且赋权的概念

Ubuntu 传达了一种理念，即一个人若是以剥削、欺骗或不公正的方式对待他人，则无法实践或表达真实的自我。没有他人的存在，一个人就无法玩耍、运用感官、想像、思考、推理、创作或控制周遭的环境。因此，Ubuntu 描绘了人与人、人与非人世界间的团结。在全球社会运动的关注核心——争取社会正义和环境永续的抗争中，它可以用来建立人类之间的团结。

这个概念包含了一种构想：人类的自由和创造力只有在伤害他人时才须要受到限制。Ubuntu 是所有众生内在的力量的体现，它有助于改善生活，且从不阻碍生命。它是一种富有生产力、促进连结并产生关怀和共感的力量——它是大众的力量，是社会运动的动力。它的相对形式：强迫、分裂、殖民的权力——超国家组织、政府、军队和企业界所行使的主权，这种形式的权力侵蚀了 ubuntu。

> 多重向度的变革

Ubuntu 具有变革的潜力，它提供二十一世纪人类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一种另类的解读：人类之间日益加剧的不平等、迫在眉睫的生态危机，以及

人类与新科技的复杂交织，甚至难以确定什么是「作为一个人」。关于最后一个问题，ubuntu 将肯认人性的重要性浮上台面，这不是透过定义「什么是人」来宣称其他实体为「非人」，而是一种在新兴科技的脉络下逐步展现人性的过程。当解决不平等只聚焦在人类身上——它是以人为中心的；而解决生态危机将目标扩展到非人世界——它是以生态为中心的。Ubuntu 具有变革性，因为它超越了以人为中心(anthropocentric)和以生态为中心(eco-centric)的二元对立。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该被看作是宇宙内部关系的一个缩影。因此，培养自我或关心他人，与关注非人世界并不对立——ubuntu 不能简单地被归类为以人类为中心或以生态为中心的范畴。自我、社群和自然彼此密不可分——治愈一个面向也会带来其他面向的疗癒，而痛苦也是如此水平地存在于三者之间。因此，争取个人自由、社会正义和环境永续可以被视为是同一种抗争。

> 注意滥用

不难发觉 ubuntu 有两个可能的限制。首先，以狭隘的种族中心主义来解释此概念，可以在政治上用来排斥他人。我指的是，某些在后殖民非洲获得政治权力的团体可能会声称这个概念属于他们——即使这与该术语的含义互相矛盾——或者认为它不该被严格审查。换句话说，ubuntu 可能会沦为狭隘的人道主义，从而导致暴行，例如近年出现在南非的排外心理。其次，由于此概念的吸引力，超国家组织、政府和企业界可以使用 ubuntu 来满足他们自己的进程；或者基于西方思维的主导地位，它可能会被同化到西方的文化档案中，进而侵蚀其本土性。■

來信寄至：

Lesley Le Grange

<llg@sun.ac.za>

Twitter: @LesleyLeGrange

> 爬梳生态女性主义辩论

Christelle Terreblanche, University of KwaZulu-Natal, 南非



于墨西哥恰帕斯州萨帕提斯特 Caracol Oventic 地区一栋建筑外墙的壁划。来源:Vitória Gonzalez, 2017年。

生态女性主义者呈现出父权征服女性与人类支配自然两种观点间的连结,包括从历史的、物质的和意识形态的观点切入。参与在不断发展的社会运动中,她们谈到女性主义、去殖民主义、环境伦理等多种政治理论,促使人们去探讨常识是如何镶嵌在传统的性/性别框架,并被其腐蚀。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在1960年代开始发展,当时就受到许多草根行动的启发。随着1970和1980年代的反核与和平运动,以及大众开始更加关注环境恶化问题,生态女性主义随之蓬勃发展。无论是有毒废弃物、种族暴力、剥削照护人员、生物多样性丧失、森林砍伐、种子商品化,或是以「发展」之名掠夺传统领域,只要威胁到物种的社会与生态再生产,就能见到女性运动者的身影。

生态女性主义者主张:如果不解放所有「他者」,人类就不可能从历史的父权体制中解放。她们看到全球北方的妇女和全球南方的农民与原住民如何凝聚成一股货真价实的政治立场,因为这群人都具有照顾人和非人生命的技能。作为一种政治主张,生态女性主义是独树一帜的,它不仅只是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或生态学的一个分支。生态女性主义的思想结合了环境正义与环境完整性的论述,并借此阐明女性主义对社会平等的关怀。

> 促进自我反思的重建革命

生态女性主义有时被视为是复兴「所有生命皆相互关联」的古老智慧。有一个例子是印度的「抱树运动(Chipko)」,几个世纪前,妇女们用手臂环绕着树木,为了保护森林免遭被砍伐的命运。不过,生态女性主义这个术语的出现是来自法国女性主义者

Françoise d'Eaubonne，她在1974年号召发起一场拯救生态圈的革命：彻底重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同时也重建男女之间的关系。先驱理论家Carolyn Merchant对欧洲科学革命的历史分析，自然之死(The Death of Nature)，揭示现代性之父决心借由制度化猎巫来控制女性的生育主权。草药医师和助产士的专业知识被「医学专业」取代，自然和身体被视为「机器」。这种概念罢黜了女性照护劳动中既有的预防原则，同时强化了一种古老的二元本体论，即理性男性的优势地位，与对「不守规矩」的女性和「混乱」的自然等「他者」的控制。

主流的自由现代主义者经常错误地理解生态女性主义批判，这反而回过头强化了父权主义的思维，即认为女性或当地人「本质上更接近自然」因而较为次等。事实上，生态女性主义者解构了源自于「人定胜天」这种旧霸权思想的二元概念，展现具有性／性别、种族和阶级优势的人如何利用二元论述「他者化」他人，以维持自身的社会支配。从这种角度理解，生态女性主义的观点可以帮助深化一个人的自我反思，理解现有权力关系如何作为自身的优势。

> 女性的劳动、生态知识和唯物主义批判

全球女性从事65%的工作，只赚取10%的工资；而在全球南方，女性生产的食物佔所有消费食物的60%至80%。Maria Mies及其德国比勒费尔德学派(Bielefeld School)的同事提出了一种「生存观点」，他们对殖民地非洲和南美洲进行研究，证实了妇女和农民作为生产者和粮食供给者¹所具有的生态知识。自1980年代以来，这种经济论点运用生态女性主义作为一种后发展的政治主张，期待能提出对当代发展的替代方案，例如拉丁美洲原住民的 buen vivir 或「美好生活」世界观，或是近期欧洲社会所关注的去成长和团结经济。另一个揭露「发展不良」(maldevelopment)的例子是，Vandana Shiva指出在引入20世纪绿色革命科术后，印度妇女农民丧失了原本实践的公共粮食主权。

金融和技术修正加剧了生态危机，生态女性主义者揭露出资本主义在此过程中是如何挪用复杂的阶级、种族和性别特征。资本主义作为一种以劳动为基础的唯物主义政治，它是非本质主义的；它连接富裕、工业化的全球北方的过度消费与它在全球南方的「水龙头和水槽」(taps and sinks)。正是资本父权生产主义边缘地带的污染性后果——成为原住民社群的

生态负债，也是妇女和后代子孙的身体化负债。Ariel Salleh、Mary Mellor、Ewa Charkiewicz、Ana Isla等唯物主义生态女性主义者连结人类生存与生态永续性²的概念。她们结构性地批判化约论经济学观点，指出它对家庭和农地中的再生产劳动，以及资本主义所依赖的自然循环视而不见。

> 生态女性主义对环境危机的超工业回应

农民和原住民——概念化成一个佔全球多数的「超工业阶级」，他们的能力表现出「身体化唯物主义」的伦理与认识论。他们跟随着自然运作进行再生产，这就是面对环境危机的现成的政治与物质回应。这些劳动者存在于世界各地，在大量且零碎并易被忽视的非异化劳动中，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复杂网路中延续生命。超工业劳动者为生态循环注入积极的「代谢价值」。显然，生态女性主义扩大了传统马克思主义进行阶级分析的焦点。并且，左派学界对于理论概念的讨论也更为深入，开始关注透过再生产劳动进行的资本挪用背后的「自然化」(naturalized)基础。然而，女性的理论化成果总是有可能被重新包装到现有的父权整合叙事中。

> 融合的公共解放和关怀

生态女性主义的政治目标是借由以共享为基础的再生团结经济促进人类解放。她们看重复杂性先于同质性、合作先于竞争、公共财先于私有财、使用价值先于交换价值。这种政治解放开始被接受，因为它能阐明综合生态学、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和以生活为中心的部落伦理(例如印度的 swaraj 和非洲的 ubuntu 精神)的讨论。关注于追求平等与永续生活的后发展替代方案，它能提供系统性的社会学分析基础。生态女性主义者主张一种关怀所有生命形式多样性的世界观。■

來信寄至：

Christelle Terreblanche

<terreblanche.christelle@gmail.com>

註1. Mies, Maria and Shiva, Vandana (1993) *Ecofeminism*. London: Zed Books.

註2. Salleh, Ariel (Ed.) (2009) *Eco-Sufficiency and Global Justice: Women Write Political Ecology*. London: Pluto Press.

> 自然权利与地球法学

Cormac Cullinan, 环境律师, 南非

Pachamama(中国纸上水墨)。
来源:Luísa Acauan Lorentz, 2019年。



多数当代文明的组织形式都是以最大程度地增加 GDP 为目标,不过这样的形式将使环境恶化、导致气候变迁。如果这些文明没办法回头向善,将促进人类福祉的方法转向提升生态的丰富度与生命力,那么他们很可能在21世纪面临崩溃。自然权利(又称地球母亲权利)的倡议者认为,为实现此转变,我们必须在法律制度中承认、维护自然作为一个法律主体,在任何意义上所拥有的固有权利。从法律上承认自然权利,不仅赋予人类/法人尊重自然权的义务;其背后更蕴含着重要的概念,即将人类视为自然中的物种之一,因而人权也是自然权的一部分。

自然权的法律承认议题,其实只是地球法学、其他生态取向的人类社会治理方法等讨论的一个面向。地球法学是法治哲学的一个分支,其目标是为人类在地球社群中和谐共处提供指引,而非合法化、便利化人类对于地球的开发与贬低。在此种概念下,自然权就像人权一样,是固有的、不可剥夺的,且是随着权利者的存在而产生。包含人类在内,自然界中的每一个面向、每一个存在,都至少拥有存在、占据一个物理位置的权利,也应该要能为了在生态、进化过程中履行其独特作用,而保有与其他生命互动的权利。

>>

> 法律明定的自然权

当代最关键的自然人权相关表态之一，是2008年9月通过的《厄瓜多尔宪法》。2010年4月22日，在玻利维亚科恰班巴举行的气候变迁和地球母亲权利人民世界大会(UDRME)上，则有《世界地球母亲权利宣言》发表。厄瓜多尔的宪法第71条即规定：「大自然／Pachamama，是生命繁衍和存在的地方，其有权利存在、持续存在、维持及再生其重要周期、结构、功能和进化过程」。由此可见，明文确立自然权的法律地位，是为了创造一套框架——在这套框架下，公民将享受权利、行使责任，并透过通过在自然中和谐共处实现福祉。除此之外，这套法律框架将要求政府依循此概念来建立往后的发展模式，并确保国家及个人都能够尊重、维护自然权。纽西兰已经立法承认旺格努伊河和尤瑞瓦拉地区是拥有权利的法律实体；印度也明文规定恒河和亚穆纳河所流经的根戈德里地区、Yamunotri 冰川以及周围的森林、水道，都是拥有权利的法律实体；哥伦比亚宪法法庭，也承认阿特拉托河流域是一个法律实体，有权受「守护、维系、保养及修复」。

> 消费主义的世界观

现代性、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皆根植于人类中心主义，即人类是独立于自然、且可以超越自然法则的。这种人类除外的观点，将地球视为一个资源的集合体，它的存在止是为了满足人类的需要。由于多数人认为资源是稀少的，为获得更多资源而与他人竞争也因而成了最重要的目标。这种世界观是大部分现代法律体系的思想背景，其将人类之外的自然定义为「财产」，并将与这些「资产」有关的大部分决策权和垄断权授予财产所有者。这为如今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提供了基础，使得财富、权力和法律决策权集中于少数人身上，并将这些少数人的短期经济利益，置于地球社群和生命本身的集体利益之上。

> 生态中心的世界观

相较于消费主义世界观，以生态为中心、且承认自然拥有权利的世界观，则将人类视为地球上的生命形式之一；与其他自然生命相同，人类也同样在地球社群中发挥着独特但并非卓越的作用。UDRME的序言和第一条规章是这样说的：地球是一个自我调节、由相互关连的生物组成的生命共同体，所有生命的存续都依存于共同体本身；因此维护整个地球社群的完整及健康，将是首要考量。自然权利倡议者指出，量子物理学、生物学和生态学等各个科学分之一的研究，早已证明宇宙中的每个面向都是互相连结的，这就反驳了主流那套人类与自然分离、高于自然

的信念。此外，这套世界观也借鉴了古老的智慧、传统以及原住民的宇宙观，将地球视为一个神圣的生命共同体，其需要人类尊重其他生命。

地球法学与自然权利的概念，从根本上挑战了主流的「发展」论述、资本主义与父权体制，并对于人类的作用、人类社会的根本目的，以及如何促进人类福祉，提出了不同的理解。例如，从生态中心的角度来看，「发展」指的是个人如何在理解自身与生命共同体之间的关系或「相互存在」意义的过程中，于深度、复杂性、同理心和智慧方面有所成长。这与强调利用、贬低复杂的自然系统，以增加 GDP 的当代主流发展论述，是完全不同的。

> 新的运动与宣言

自2008年以来，自然权利和地球法学已成为世界各地的社会运动、环境与社会正义倡议者，以及原住民论述中日益突出的面向之一。这些概念已经成为联合国内部讨论如何「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核心，并被纳入一些绿色和生态社会主义政党的方案中。自然权利和地球法学不仅处理了当代环境和社会问题的最根本的源头，更提供了一个超越种族、阶级、国籍和文化的宣言。除此之外，它们基于宇宙如何运作的观点，比起人类中心主义、机械主义和还原主义的世界观更为精准。自然权利给了全球各地的权力运动一剂强心针——既然人类权利的社会规范是可以被改变的，那么有关哪些人类行为才合理的社会规范，也是可以迎来改变的。虽然自然权利运动仍处于起步阶段，但其影响力可能会持续快速地增长，并最终产生重大的全球影响。■

來信寄至：

Cormac Cullinan

<cormac@greencounsel.co.za>

> 后疫情趋势与现 代性的诸阶段

José Maurício Domingues, State University of Rio de Janeiro, 巴西, ISA 社会学理论(RC16)及历史社会学(RC56)研究委员会成员

于 2019-20年降世的新冠疫情暗示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将发生的巨大改变。自2008年起,新自由主义已经受到约束。忽然的疫情带来了所谓的紧急凯恩斯主义以及为了让国家不至沉沦而大幅度扩张的社会政策。只用了短短几个月甚至几天的时间,那些不可想像的事都成为了可能:所采取的应对措施和对经济及安全网投入的资金数量令人震惊。凭着其「效能」以及为了面对现实的处境,国家惊人地回归了¹。

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变化吗,或者说,其实我们观察到的不过是无关紧要的变化?这样的转变是否会持续?这是为相对稳定的政策轨迹划上句点的时候了?²接下来,我会优先讨论现代性的诸阶段,来就国家对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干预勾勒一个答案。严格地来看看政治系统,始终保持着连续性,尽管社会的许多方面都要求进行深层的变革。自由民主是一个混合的政体,而自1980年代以来展开的更多的寡头政治和更少的民主的趋势(朝更极端的寡头政治系统前进)并未被扭转。监视明显地增加。尽管对更健全的社会政策的要求不断增加,政治家们还是只关心自己、关心他们的权力和财富。个人主义蔓生,新冠疫情可能加剧了它并引发了主要防卫性及私人导向的态度,与一个世纪前的「西班牙流感」疫情后社会性的加强形成强烈对比。这些当然是有待社会学去加以分析的问题。而我于此不得不说的只部分地适用于更新的党-国兼资本主义系统的世界,在那里国家的在场要强烈得多且有一个更具权威的政治系统在运作。然而,从社会政策来看,社会自由主义的盛行说明了这点。

> 现代性及其诸阶段

现代性——包括政治现代性——是一场偶然的渐进分歧。然而,它是透过杂化而奠定在先前发展

起来的具有逐增的全球性特征的文明元素,从而凭借其支配性力量克服了专制集体主义所带来的相对短暂的挑战。自十八世纪末以来,它在三个不同阶段上发展(如 Offe、Lash 及 Urry 等人的工作所显示的)。第一个阶段是自由主义和市场导向的(或可视此为一种计划);它同时是殖民主义的(尽管美洲已经独立)。第二个阶段是以国家为基础的,可说是世界通行。尽管自由主义的经济和司法结构持存着,但「真正的社会主义」(更恰当地说是专制集体主义)则激化了它从现代性中借用的国家元素,并抛弃了自由主义和市场基建。接着,伴随着更强的网路在场——贴紧市场与国家的强化——并在新自由主义的庇护下,更为复杂,更为个人主义式的第三阶段开始了。

我们是否在一个后疫情的世界中,见证着一个新阶段的出现,又或只是第三阶段的某个拐点?在党-国范围外,新自由主义已经佔据主导地位直到如今(且其支持者也在努力维持其主导地位)。无论如何,我们可以假设现代性的第三阶段与新自由主义之间的合作仅仅是偶然的,不管它将在世界留下多么深刻的痕迹以及究竟发生了什么。

> 国家、经济与社会政策

早在疫情前,新自由主义已被认为在应对经济的问题上太过有限;或明或暗地,各国政府已经开始摒弃其某些原则,而如今强大的代理人似乎也越来越多意识到这个问题。然而,伴随发展常常遭遇的不一致、阻力和不透明,实施变革的过程变得更加复杂。虽然我不能于此展开这个问题,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的地缘政治和竞争也是上述转变的背景,前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使用了新自由主义和强国家干预的组合技。

「我们应该将其视为跨时代的改变，还是有些不重要的变动？这种转变会持续下去吗？」

让我们以欧盟为例。我们可以分辨三种可能的未来情境：一种是保守的（一切照常）；一种是有点混乱与冲突的；一种是随机应变的，其中的目标是应对气候变化（尤其通过能源转型）、数位化、改革社会政策以及税收变化。透过向市场借贷而来的共同资金，「下一代欧盟」计划已经将欧盟推向了第三种可能，伴随着「欧洲国家」（按：指欧盟）的强化，从而甚至使强大的民族国家的任务变得容易（透过与它们结合；比如，通过资助高达40百分比的法国重启计划使该计划在2030年之前的技术更新得到实现）。至于税收，除了为避免各公司的避税天堂计划或更一般地说，逃税，而采取的对各公司征收15分比的全球统一税率外，没有太多的讨论（美国除外，在那里富人税被削减）。无论如何，专家和政治家在疫情时期讨论许久的全球企业税率可能仍被限制，如批判家所争论的那样，这是前所未有的。它的力量增长与否是有争议的（例如在德国，避免遵守禁止进一步举债的宪法条款的做法已经被采纳，几乎没遇上什么麻烦），但朝着这个方向的运动可能会推进。无论如何，政治系统将调解这些监管变化。在美国，经过激辩，民主党在2022年8月最终批准7400亿美元的项目以应对通货膨胀，并推动以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燃料以及降低医药成本，这是一个突破，尽管比左派希望的要温和得多。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为经济基建的更新提供资金的建议，尤其是在数位化方面但也包括更一般的东西比如桥樑和道路，并允许能够缓解美国和欧洲正在发生的气候变化的能源转型。战略性的，特别是那些高科技的地区可说是最紧要的，其中微芯片尤其突出；大量金钱和国内社会组织将促进此类目标和国家对创新产品的采购（国家对新冠病毒疫苗的支持证明了这种战略的有用性）。产业政策正在捲土重来：尽管与自由资本主义国家的全盛时期有很大不同（在于更具「指示性」），但与20世纪最后四分之一和21世纪初的情况相比，它已经变得更加相关。有人谈到规划的回归，特别是关于气候变化和能源转型。无论如何，预算的限制整体上已经变得更加宽松——而支出变得更有弹性，甚至包括许多救助行动。

在贸易和金融监管方面，一个真实的变化正在发生。几十年来，反托拉斯政策在被认为已经不攻自破

的情况下被轻视了。自雷根政府以来，它们就被假定要和消费者福利一起考虑。因此，倾销、降价等打败竞争对手的行为就不被视为一个问题。目标是保护竞争本身，而非特定的竞争者。如此以来，透过合并和融合从而创造巨大寡头垄断的行为便不值得干预啦。这正在[被彻底修正](#)，反托拉斯政策更加全面和详细。此外，监管方案已经从典型的和更有限的美国制度取径扩展到处理面向消费者的市场服务，特别是基本垄断类产品（电话和邮政、水和污水、或火车和航空）以涵盖社会政策与其它活动。

然而，至于社会政策，我们似乎看到更多类似的情况。社会自由主义（social liberalism）以其双层政策——一层是为富人提供市场基础；另一层则是为穷人提供国家供应——已经成为常识。到目前为止，在社会政策的演进中，还未确实出现过能够动摇稳步扩张的社会自由主义的稳定性的关键点。然而[医疗保健可能更加普及](#)，因全球化的、社会自由主义的回应第一次以似乎更普遍的方式出现了。虽然过去存在显着的差异，特别是在全球系统的中心（包括一些专制集体主义国家）以及外围之间，前者具有更坚固的和趋向于普遍主义的政策，但目前社会自由主义无疑地在全球范围占据了上风。它专注在贫穷——关键是公平（equity）而非平等（equality）。尽管存在广泛的社会不满，还没有过任何组织表现出足够的力度，或甚至曾尝试过，使社会政策导向普遍主义和充分的社会公民权。

显然地，现金转移方案将成为主流。这可能与拉丁美洲最低限度的授予和所有这类或其它的国家都抱持的目标³——即打击同时政治地管理贫穷——有关；或者也与极其刻薄的德国失业津贴——也有Hartz IV 的说法——及其劳动福利原则有关。种种这些在一个日益富裕的不平等世界里其实都是虚伪的。诚然，像德国新的、[优化的公民财（Bürgergeld）](#)可能在为应得的失业人士提供少量资金和更慷慨的普遍条款之间，最终指向一条新的社会民主主义的道路，尽管受到基督教民主党的坚决抵制——另见最近义大利梅洛尼政府更为刻薄的无条件基本收入。总而言之，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变革将是有限的。

> 未來

惟待时间证明：密涅瓦的猫头鹰有可能只在黄昏时展开翅膀。但至少我们可以标记出一些似乎在过去几年中已经展开并且可能会继续加强的具体趋势。无可否认地，这一切都取决于思想和计划以及也特别是政治斗争的开展，尽管后者的结果往往指向同一个方向。世界各地的发展至今仍是发展不平衡的。

我们可能希望这种改变会在人类史上引入一个更为慷慨、绿意盎然和团结的时代。不过这看起来似乎不太可能；然而这不意味着现代性的新阶段，或第三阶段的一个拐点不会发生。不论如何，它的终极方向仍是不确定的。■

註1. Domingues, José Maurício (2020), “From global risk to global threat: State capabilities and modernity in times of coronavirus”, *Current Sociology*, 70(1), 6-23.

註2. Baumgartner, Frank and Jones, Bryan (2009) *Agendas and Instability in American Politics*.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註3. Domingues, José Maurício (2019) “Social liberalism and global domination”. In: Heriberto Cairo and Breno Bringel (Eds.) *Critical Geopolitics and Regional (Re)Configurations: Interregionalism and Transnationalism between Latin America and Europe*. London: Routledge, 49-62.

來信寄至：

José Maurício Domingues

<jmdomingues@iesp.uerj.br>

> (重新)开放社会科学： 开放科学的挑战¹

Fernanda Beigel^{*} 国家科学与技术研究理事会和 Universidad Nacional de Cuyo^{*} 阿根廷·ISA历史与社会学研究委员会(RC08)指导委员



来源：Pixabay。

1996年，ISA前主席 Immanuel Wallerstein 在著名的古尔本基安委员会的报告中，呼吁国际社会重组社会科学。该报告对这些学科在19世纪的发展提出质疑，当时这些学科伴随着欧洲殖民国家的发展，将这些特殊经验与观察视作所谓的普遍理论结构。这些学科的整合与制度化规定，不同的学科应拥有专门的方法论，这强化了社会分析间的隔阂。在「开放社会科学」的口号下，该报告指出应抛弃欧洲中心主义，并促进多语制、跨领域、以及研究过程的公开透明与国际合作。

近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开放科学议案》，此议案借鑑了相似的顾虑，并着力于开放研究成果（借由开放出版物的权限）与研究过程（借由开放资

料权限）。开放科学涵盖了所有科学学科与所有面向的学术实践，包含基础与应用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它强调传统科学对不同知识体系开放的必要性。它也倡议与不同的社会领域合作，以及积极参与社会（公民科学）的相关问题。

这两个全球计划的发布时间隔了25年，其主要区别在于开放科学的数位化特征，及透过基础设施协作来强调研究过程的开放性（开放资料、开放评估）。另一方面，这两个计划的共通点，在于影响知识流通过程中结构性的不平等的关注，以及确保认识论多样性与多语制的必要性。

>>

> 对社会科学资料公开的维护

由于其认识论的特征、与研究对象的关系、以及调查方法, 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对开放科学计划提出了具体的挑战。不加选择地公开研究过程与其收集的资料, 将影响个人隐私, 并可能危及次级社群。然而, 道德规范、「保护个人资料」等规范及关于个人资料使用的国家法规都为这方面提供了充分的保障, 这也是为什么有必要反思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对共享研究资料的抵抗。

在不太习惯团队合作的学科中, 这种抵抗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担心失去工作的知识产权, 或降低个人在学术或理论上的成就获益。正如「硬」科学的情形, 人们承认科学的社会价值, 但难以接受由公共资助的研究是符合公共利益的。共享研究资料最直接的意涵, 是「知识是一种累积」, 因此我们应该避免不同的研究团队重复搜集相同的资讯。在这个领域也有一其他的声音, 认为公开特定涉及个人资料的研究资料, 可能造成研究对象被辨识, 而这本来就是经验研究的一部份缺陷。

向科学界公开提供资料并产生协作基础设施的主要优势之一, 在于这些平台具有相互操作性, 可以整合每个数位物件的制作者、其机构、项目与资料的开放权限。机构储存库在数位物件的管理中起到基础的作用, 不同类型的资料集与科学产品能够与学术评估存放在一起, 作为其品质的保证。开放评估是开放科学中尚未在全球范围达成共识的一个面向, 它能够促进知识对话, 也有助于解决学科中普遍存在的意识形态对立或理论争议的问题, 这些问题往往最后会成为文章出版的一大挑战。

然而, 开放科学不仅只预告了其优势, 英语作为操作性代码的主要使用语言也加剧了不平等, 强化了英语科学传播的过度同质化, 也可能危及文献多样性。同时, 主要在欧洲地区, 透过如「联盟S」的「S计划」与对直接收取作者费用(文章处理费: APCs)等程序, 使他们得以更快速地获取科学出版物的开放权限。为了维护出版商极高的利润, APC的金额逐步攀升, 这已使得霸权国家与非霸权国家的研究人员间产生了更大的断裂。开放科学计划是一个充满张力与搏斗的持续建设。

> 质疑欧洲中心主义, 实施情境化开放科学

重新审视由 Gulbenkian Report 协调出的《古尔本基安报告》, 其所发起开放社会科学计划, 有可能让一个计划重现生机, 这个计划旨在质疑欧洲中心主义与殖民主义知识体系的基础, 而这样的体系也是开

放科学计划的一部份。同时, 这个计划也指出, 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在本能够更踊跃的计划中显得有些边缘。无论是民族志动力学, 或是与弱势社会群体共同生产知识, 社会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研究特殊性, 使得共享研究资料变得困难。造成这些困境的原因有许多, 与个人或组织相关的资讯, 以及其所建构的资讯类型具有高度敏感性, 这些讯息有时只能在机构储存库的共享资讯集以特定形式被存放。

在这个意义上, 机构层面的设置能力对于回收所有标准设定, 与普及开放科学准则和良好的实践至关重要。此外, 研究者必须做出更重大的承诺, 以推动开放公共资助的研究资料, 并修订开放资料集, 将其脉络化, 使其能够应用于每个研究领域的特定需求。

开放科学的一个主要面向——公民科学——为社会科学中参与性科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理论与实践空间。几十年来, 拉丁美洲发展了参与性科学的理论传统与方法。除了 Fals Borda 的贡献外, Paulo Freire 的《公众教育》和《南方认识论》等实践也是重要里程碑。自20世纪初以来, 大多数拉丁美洲大学一直在实施推广计划(第三个任务)。大学与社会间的互动提供了促进知识共同生产的实践累积, 也建立了扩大开放科学参与性的进程。

在这个意义上, 参与性科学的新颖之处并不在于某些社会群体被「邀请」与科学家合作, 而是在于它与科学权利与审查权利相关。要使参与科学有效地开放, 并作为一项基本人权加以行使, 我们必须意识到, 研究人员并不持有以公共资金来蒐集到的资料的所有权。最重要的是, 参与社会研究的社区不能仅仅作为被采集资讯的人, 却没有处理与解释的权利。

公民科学并非社会科学的特权。相反的, 调查经验大多与环境科学有关。但在世上的某些区域——主要是较边缘的地区——有建立出一套参与性行动科学的传统, 这种科学提供了一系列可以推广的方法论原则。在大学层面, 在批判性扩展传统中累积了一系列的常规与经验, 这代表着发展公民科学与多元大学知识的重要累积。

> 民主化、资讯正义和消除不平等

为促进科学的开放与参与性, 我们须打破资讯不对称与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开放研究过程需更加明主的治理体系。原住民资料治理原则CARE(集体利益、控制权力、责任、道德)提供一个概念框架, 能扭转学术团体与社区在科学实践中历史性的权力失衡。尽管如此, 评估与援助系统仍需要具体的行动与奖励措施, 并依据不同社区的需要, 在机构层面加以考虑。

>>

数位基础设施的全球不对称、知识流通的语言、与学术声望的累积，对每个国家和地区的科学开放条件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从这个角度而言，Wallerstein的计划和开放科学计划之间的对话在今日变得更有效益。若要坚持下去，需要一些与科学去殖民化相关的反思，为全球南方制定开放的科学政策。我们胜利可能需要设想一种新的学术外交形式，将科学学界中多元的行动者聚集在一起，如国家专业协会、区域网路、出版商、学生、图书馆馆员、研究人员与国际组织。

开放研究资料并使其能够自由取用，以供共享和再次使用是开放科学的核心问题。但它无法保证这些资讯的互相操作性，也无法确保社会对研究成果的利用，与研究成果与特定社会的关联。当今科学发展的逻辑与基于「主流」生产模式的全球学术体系联系在一起，这种模式在各个层面都有可议之处。为了在学术界取得进步，需要进行许多讨论，推翻原有的广泛信念。

由于其特殊性，单独分析原住民传统知识的开放性是至关重要的，这是教科文组织在制定《开放科学议案》期间着重讨论的主题。在为此目的召开的全球协商会议上，原住民社群对此提出批判，表示这其中意涵着强制开放原住民知识的观点，这使得《议案》有了重大的修改与新的措辞。有一些研究也指出传统原住民知识的提取和商业化的过程，甜菊糖是巴拉圭瓜拉尼家族知识贡献的典型案例，位于Amambay山脉中，他们发现了甜菊的存在、其具有甜味的特征、其生展地点与生长讯息。根据帝国大都市科学机构制定的规则与程序，人们对其进行征收与加工，将这种蔬菜投入资本主义经济理性中，会有利于开发的过程。在向其他知识系统开放科学时，必须重申《联合国原住民权利宣言》(2007)的议案，以及原住民部落对其传统知识的自主与不可剥夺的权利。

相应地，科学政策在地方、国家与区域的锚点，在各个维度上将科学主权至于非霸权国家公共议程的前沿；例如，商业平台或出版商取用资讯的反馈、原住民知识的自治政府、以及在全球标准与地方研究标准之间的脉络平衡中讨论科学的社会相关性。我们要意识到，基础设施的不对称是促进认识多样性的一个关键因素。同样的，我们也应该制定政策，消除知识生产过程中的社会不平等，以及知识流通中的种族、族群、障碍或性别的不平等。这些不平等是多标准的，我们必须找到解决方案，以促进能达成社会、认知、和资讯正义的开放科学。■

來信寄至：

Fernanda Beigel

<fernandabeigel@gmail.com>

Twitter: @BeigelFernanda

注1.这篇文章的英文完整版即将在全球观点期刊的特别刊「拉丁美洲的社会科学」上发表。

> 多元社会学的南方概念

Mahmoud Dhaouadi, University of Tunis, 突尼西亚, ISA 历史社会学(RC08)、宗教社会学(RC22)、语言与社会(RC25)委员会成员

“**总** 社会文化影响力(TSCI)是一个现代社会科学中不会使用到的概念,可以将其定义成是一种,会全面影响到社群或社会中每一个人的社会文化影响力。也就是说,没有人能偏离TSCI 的规范,这与认为社会文化规范中的偏差行为是不可避免的主流社会学观点背道而驰。在美国确实有许多关于偏差行为主题的出版物和大学课程,而正是在这种强调偏差的人类社会背景下,我分析了两个社会文化规范中不会出现偏差行为的例证。第一个是在突尼西亚社会里,另一个是在所有的阿拉伯穆斯林社会当中。因此,我的 TSCI 概念正是与当今日益增长的「多元社会学」和「去殖民化社会学」站在同一阵线上。我对 TSCI 的概念是出于以下两个特定现象的观察。

> 禁止饲养雌性动物

调查指出,突尼西亚东北部(Ras Djabel、Rafrat、Ghar El Melh、Sounine、El Alia 和 Meteline 等城镇)严禁饲养母骡、母马、母驴。从该地区的社区规范可以看出,饲养这些雌性动物的行为会是一种难以接受的社会丑闻。城镇居民的这些深根蒂固且广泛存在的社会文化规范,甚至使他们避讳于使用女性名称来称呼非生命体。例如,他们用阳性名词「camion」(卡车)取代了阴性名词「camionnette」(面包车)。这些社会文化规范对该地区所有居民的行为都产生了全面性的影响:所有居民都只饲养公骡、公马和公驴。

正如前所说,在当地文化中饲养这些雌性动物是可耻的。即使只是在公共场合提及或谈论雌性动物,也会被以尴尬或暴怒等负面情绪回应。当地拒绝饲养雌性动物的文化,使得当地人对突尼西亚或突尼西亚之外的地区中,与此事相关的现有社会文化规范漠不关心。

为了解释这一现象,我的假设是该地区的土地无法满足大量动物下的需求,更不用说雌性动物可能会让潜在的需求持续增加。此外,当没有拖拉机、卡车和汽车时,居民确实需要一些动物来耕种他们的小块土地并搬运物品。在这样的背景下,只饲养雄性动物就成了最佳策略。

> 男性的割礼

应用于饲养动物的 TSCI 概念也可以更广泛地应用于阿拉伯穆斯林世界。所有突尼西亚穆斯林都在全国各地实施男童割礼的习俗。也就是说,突尼西亚所有阶层(底层、中产和上层)的家庭都没有例外。事实上,这里并没有任何余地能够偏离割礼的社会文化规范。

> 社会学观点

我对这两种现象的分析揭示了两者之间的相似之处。在第一种情况下,突尼西亚东北部的所有居民都拒绝饲养母骡、母马和母驴;在第二种情况中,所有突尼西亚穆斯林都参与了男性割礼的实践和祝贺活动。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这两种现象强调了男子气概在突尼西亚社会中的重要性,特别是在突尼西亚东北部社区。

TSCI的行为,作为一个在当代西方社会学文献中几乎找不到的新概念出现。已故的Immanuel Wallerstein 在美国社会学期刊中撰文时,似乎并未意识到这里所解释的 TSCI 概念:「我们可以提出并没有一个群体文化规范(所有层级)会被所有成员完全遵守的假设。」

他的主张并未反映在本文中举例的突尼西亚社会和阿拉伯穆斯林社会的文化规范中。如前所述,阿拉伯穆斯林和西方社会之间潜在的文化差异,与当今去殖民化社会学和多元社会学中越来越高涨的呼声正是彼此呼应。因此,社会科学家有理由问:TSCI能应用于非阿拉伯穆斯林群体或社会中吗?

不管这个问题的答案如何,对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来说,理解和诠释前面例子所述的强大 TSCI 的形成原因非常重要。想要知道这个难题的答案,就需要研究人类社会中的文化系统和社会结构。上述的例子都提高了本文主要假设中的可信度,强调了突尼西亚和阿拉伯行为中不可避免的 TSCI。■

来信寄至:

Mahmoud Dhaouadi

<m.thawad43@gmail.com>

> 拉丁美洲社会学与当代文明危机

大会宣言
拉丁美洲社会学学会
第53届拉丁美洲社会学理事会



巴西艺术家和政治学家 Ribs (https://twitter.com/o_ribs 和 <https://www.instagram.com/o.ribs/>) 为社会理论和拉丁美洲研究核心的社会运动观察站 (NETSAL-IESP/UERJ) 所作的插图。
来源: Ribs, 2021。

在 现今所面临的全球危机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一方面正经历着主导部门推动的计划和其内部盟友的紧张关系，另一方面也与生存饱受威胁的广大群众其需求产生紧张关系。资本主义成长积累一种新的由边缘社会融入全球市场的新形势，而科技进步与制造方法的日新月异进入日常生活，在这其中亦扮演着重要角色。对于边缘社会而言，这意味着内部市场遭到破坏，如同

分裂为一现代全球化中的一支，而绝大多数的人则沦为其体系下徒具功能性的消费者（其经济活动根基于传统形式的制造仍会存在，如一些非正式的工作或现代制造部门中的低阶劳动）。

我们也正处于气候与环境危机的历史时刻，民主权利的挫折、军事化的恐怖主义，以及在粮食、能源、移民和种族政治上等浮上台面的危机。数十年来

>>

新自由主义已经舍弃了公共服务，该学说还剧烈地影响经济之外的个人与集体良知和主观意识。于此同时，我们的社会正因显而易见地不平等而分裂，尤其自新冠肺炎疫情以来更为显着。

> 在历史关口的拉丁美洲

在这个设想上，我们认为这个区域正处在社会、经济与政治的新形态，且必须建立一新的社会政治计划来回应我们这个时代的挑战。一部分，全球地缘政治的重组、美国主导势力的弱化与其他势力的出现——特别是中国——在新的全球霸权争夺上带来了新的压力。另一部分，多元政治与社会运动的蓬勃也引发了人们社会中不同的议题的重视，如女性主义、环境主义、儿少权益、反种族歧视与原住民族社会的未来。也就是说，这些新的可能性和生态社会转型的具体乌托邦理想是借由区域中的抗议和日常争端所形塑的。

然而，这两股互相敌对的势力，其力量是相当不对等的。即便是在那些大众已经拥有较大选择权，甚至能够影响政府的国家，权力项目仍然具有支配性。我们可以看到，虽然这些由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驱动的社会经济与文化进程，有着失败的结果，但他们还是持续存在，并引导人类走向灾难。民众由过度膨胀的希望中获得力量，但前述的进程导致大众的政治力量受到限制、面临挑战。佔据霸权的部门急欲对自身将被削弱的力量做点什么，而与支持民众的势力展开斗争，而人们则深陷在这场战火中间，并经常因为期望未能实现而感到沮丧。

> 当代拉丁美洲社会学的角色

这就是拉丁美洲社会学在历史上曾经做过的。我们必须去唤起，例如从成效显著的散文创作风格转型至科学性的社会学的标志性创新、透过致力于社会学和行动研究来克服后者、借由依附理论与政治生态学来质疑发展理论、女性主义的认识论创新，或透过拉丁美洲式的提议来重新诠释社会运动借此挑战西方世界的理论霸权。这些创新，我们可以称之为重建，来回应社会变迁。

在这一点上，去指出理论和实践的改变中社会学必须去分析和理解复杂的全球和区域体系。我们必须去质问是否有改组 ALAS 工作小组的需要，和我们核心辩论中所思考关于气候、贫困、发展模式、

社会运动、文化和身份认同转变或殖民等复杂问题的优先次序。

拉美和加勒比海社会的改变已在本文中大致描绘，并试图鼓励拉美社会学自我复兴的同时，拯救过往70年来 ALAS 业已完成的批判性遗产。我们必须革新自身观点和为了转型工作所做的理解。我们也必须大力捍卫社会学、公立大学和我们境内和世界上正饱受威胁、报复、监禁甚至遭到谋杀的社会学家。我们尊严地站出来和呼吁加入这场国际行动来强化与转化我们所身处的学科环境。

本宣言避免直射任何一个国家或作者的名讳，只有一个例外即是：Pablo González Casanova，墨西哥伟大的社会学家和前 ALAS 会长，借此纪念其身为社会学家所投注的心血结晶与庆祝其百岁生日。愿其所致力的一切作为现在和未来世代的拉丁美洲与加勒比海地区社会学家的榜样。■

墨西哥城，8月19日，2022年

> 破碎的巴西

Elísio Estanque, University of Coimbra, 葡萄牙, ISA 社会阶级与社会运动(RC47)研究委员会成员, 与 Agnaldo de Sousa Barbosa, São Paulo State University, 巴西



在一个较为热闹的街区,巴西国旗挂在衣服之间。
来源:Charl Durand, Pexels

巴西严重的社会分裂已经众所皆知,不过在最近的选举争议的背景下,笔者认为有三个面向的分析——即历史、社会经济和政治,可以帮助来自各地的读者,理解该国目前面临的矛盾和挑战。

> 历史

在首次传教行动的500多年后,奴隶贸易和殖民制度对当地社会造成的残酷影响,成了巴西菁英阶级的起源,他们的帝国概念最终也渗入了自己的共和运动。独立之后,帝国动荡时期(1882-1889)演变成了菁英阶级中不同分支间的激烈冲突,使得民族/国家历程难以进行。第一共和国的出现,

则取得了执政机关中保守部门的支持,当时他们仍对废除奴隶制(1889年)心怀不满,于是意图将大众排除在政治外。同时,与地主势力密不可分的「coronelismo」所形成的社会趋势,直到二十世纪 Getúlio Vargas 推动的变革之前,一直决定着巴西的政治形势。在这次变革中,新的工业资产阶级从1920年代开始扩张,并从老地主和咖啡种植主那里继承了透过剥削取得的「地位」,更承袭了「coronelismo」的独裁精神。即便巴西在Getúlio Vargas 执政时期(1930-1945)向新企业家菁英靠拢而抱持的发展主义之下,经历了工业化、城市化与国家进步;军国主义仍持续着统治阶级的菁英主义野心,最终导致了总统自杀(1954年),以及后来的军武政权(1964年)。

> 社会经济

社会经济层面,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时,社会运动逐渐于巴西的政治议程中成为要角,为军事政权的结束铺平了道路,其中包括 Lula da Silva 为核心的新工会主义。改革的浪潮与 Lula da Silva 一派日后的行动,一同成为了推进民主的动力。即便如此,Lula 势力的成功,仍然为机会主义往后的胜利埋下契机——Collor de Mello 最终促使中间偏右的巴西社会民主党和 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 崛起。政府的成功经历了一段时间之后,在「真实计划」引入新货币的金融改革下,90年代末开始,经济陷入停滞,高额外债和有利融资的税收政策,导致了社会不稳定、非正规劳动、低薪和不平等现象的增长。

> 政治

在当代的巴西社会,人们对于政治的意识是分裂的,特别是在选举的时候。接下来,我将回顾一些巴西在政治制度上的细微、却极为重要的差异。在巴西,其政权的型态可以说难以归类。巴西政体的运作是由「总统制联盟」这个不成文的规则所决定——仔细来说,就是总统权力的稳定很大程度取决于议会。也因此,这样的政权虽是总统制,实际上却没有总统制的形式。用 Cicero Araujo 教授的话来说,这种运作形式是某种「无形的议院」,其自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 时代以来,已经「非正式地成为

>>

国家权力的平行管道，与官方的所有运作互相交织。这包括各层级的政治代表和经济势力之间的混杂关系，特别是那些公共机关最为依赖的经济力量。」此外，在巴西的投票中，如果是总统、联邦议会、州长、州议会和参议院的大选，则需要同时进行多轮投票。这代表选举中需要在峰会上进行多次谈判、期间会发生持续不断的讨价还价与政治／经济交易。也就是说，选举过程中有许多介入操纵的机会，这就造成了人民对于政党和民主本身失去了信任。

> 恶魔的选举

最近的选举论辩中，也反映着上述的分裂。事实上，这不仅是一场「思想的辩论」，而是一场选举霸权的争夺战，其手段涉及了策略、结盟，以及民意调查。原先不同政治势力之间的利益对立，晋升为妖魔化选举对手、不断向对方施加压力的摩尼教式论述。在双方都被塑造成撒旦形象的情况下，仇恨情绪便成为了选举结果的决定性因素。为了在由 Ciro Gomes 和 Simone Tebet 为首的「第三条道路」阵营落败（他们在第一轮中仅取得7.2%的选票）之后重掌大势，Bolsonaro 和 Lula 指责敌方候选人对国家、人民有恶魔般的意图，进而动员基层民众，并试图吸引中间选民。如今巴西的政治就如同欧洲，恐惧和怨恨被当成选举时的竞争武器。

> 失败的仇恨与政变

在媒体、福音派教会和数位网路（如微信）的协助下，经济方面主要的利益集团（尤其是农商部门）被深植于当地社会的反工党情绪感染。在这种仇恨论述中，其对象不仅包含工党和 Lula da Silva，也针对所有与左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光谱扯得上关系的群体或阶级。忙于面对即将到来的经济退与生活困境，此时的一般民众，早已没有保留理性的余力。为了解决经济问题，Bolsonaro 试图采取孤立措施来控制燃料价格（即使这可能会牺牲国家提供给公民的服务品质），但仍然力有未逮。面对敌方势力，Lula da Silva 没有花太多力气说明己方未来的政策——对他来说，回顾自己在第一次任期中为国

家带来的成功就很足够了。当时，巴西人民——特别是穷人——在21世纪初亲身经历了所谓的「黄金十年」。政变的隐患于选举前期潜伏了很长时间，但后来司法部门的主要机构（高级选举法庭及院长 Alexandre de Moraes）站了出来，设法解决了激进武装势力可能造成的威胁。

> 路障与正常化

在 Lula da Silva 获胜后，巴西社会弥漫着一股强烈的紧张情绪，就连落选候选人也在选举结束后超过两天的时间里，都没有发表落选声明。一些较为激进的社会团体，更在主要道路上设置了数百个路障，并在立法程序开始时，破坏了巴西的三个政府建筑。借此，民众表达了他们对于 Lula 无视民主精神重返王座的愤恨，也挑战了司法系统。许多意见领袖试图透过舆论，将行动谋划者的风向带到 Bolsonaro 相关势力身上。在此期间，代理总统一直与整起事件保持距离，但最终还是姗姗来迟地出面，呼吁要将抗议者遣散。虽然他的行为没什么说服力，不过还是平息高昂的反动情绪。从政府于制度层面转型的努力，可以看出巴西正走在「正常化」的道路上，带来了新的希望。这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并非不可能。■

來信寄至：

Elísio Estanque

<elisio.estanque@gmail.com>

Twitter: @ElisioE

Agnaldo de Sousa Barbosa

<agnaldo.barbosa@unesp.br>

> 伊朗：这不是抗议，是革命

伊朗之声



支持伊朗抗争的街头游行，口号为「妇女、生命、自由」，2022年。
来源：Flickr。

2022年9月13日，来自伊朗萨盖兹的22岁库尔德女性 Mahsa Amini，在德黑兰被所谓的道德警察逮捕，原因是因为她穿着不得体。三天后，Amini 因在拘留期间遭到殴打而陷入昏迷，随后在医院死亡。

Amini 的死亡在伊朗各地引发了新一波的抗议浪潮。抗议活动不仅要求终结性别隔离，还号召众人推翻伊斯兰共和国。由于伊朗政权的诸多弊端和改革派的背叛，使得抗议者不再相信改革。他们要争取的是革命。

> 伊朗的抗议浪潮

作为当前抗争运动的一部分，许多年轻女孩和妇女借由摘下头巾并在公共场合焚烧的行为，表达她们反对国家强制的面纱规定和其对女性身体的控制。尽管在过去四十年中，女性在抗议活动中是积极又不可或缺的角色，但性别问题本身从未被列入抗议活动的议程——除了1979年的抗议活动，当时女性抗议政府强制戴面纱的立法计划。回到现在，学生在这次抗争运动中提出的第一个诉求，则是废除大学食堂的性别隔离措施。

在这场运动中，看得见年轻女性在公共场所抗议的身影，以及以「妇女、生命、自由」的强力口号作为中

心的理念，还有在大众文化和艺术生产中女性和性别的主导符号，再加上性别议题也被牢牢列入议程中；但抗议者的诉求非常多样化，而且不限于女性或性别议题。这场抗议运动特别集结了来自不同世代、社会、种族、信仰和地区的伊朗人，当然也不分每个人的性别。来自全国各地的男学生、教师、医生、商人、工人或平民都加入了抗议和罢工。因此，可以说我们正在目睹一场动员庞大的社会运动。

面纱的难题是伊斯兰共和国自1979年以来未能解决的众多问题之一。为了维系伊斯兰的认同与特质，政府严格控管了强制戴面纱和性别隔离等议题；但却发现自身陷入了僵局，无法做出任何调整或法律修改——尽管大约一半的伊朗人口都反对强制戴面纱。

该政权的许多政治、社会和经济弊端以及管理不善的例子，使许多伊朗人不满、沮丧和绝望。他们在2017年、2018年、2019年和2021年抗议失业、汽油价格上涨、水资源不平等、空气污染和经济管理不善等问题。Mahsa Amini 的死亡是压垮幻灭的伊朗人的最后一根稻草。

抗议者不再要求改革或改善体制，他们也不再相信改革。从1990年代末到2009年的绿色运动期间，可以看见关于法律转型、政治改革和女性权利的激烈

>>

讨论；但随着许多改革派人士遭到残酷镇压、逮捕、软禁、酷刑和逼供，改革的时代就这样戛然而止。

> 「我们不再害怕，我们要战斗」

2022年11月，司法机构负责人Gholam Hossein Mohseni-Ejei 邀请抗议者坐下来谈话。他说：「我准备好了，让我们谈谈。如果犯了错，我们可以改过自新。」但抗议者却是将他的作为视为另一种背叛的计谋。他们以诸如「这不是抗议，是一场革命」之类的口号回应。

抗议者甚至号召终结伊斯兰共和国。他们高呼「独裁者去死」或「Khamenei 去死」，并在墙壁和旗帜上写下「我们不再害怕，我们要战斗」，以表达他们的无畏和决心。抗议者声称他们正在引领一场正在酝酿中的革命。许多象征伊斯兰共和国的重要标志已被摧毁或烧毁，其中包括警察局和巴斯基站、写有像是「伊斯兰共和国街」或「巴勒斯坦」的街道标志、伊斯兰共和国创始人Ruhollah Khomeini及伊斯兰革命防卫队(IRGC)指挥官Qasem Soleimani的雕像，以Khomeini和现任宗教领袖Ali Khamenei 的旗帜和照片。

伊朗政权在抗议前三周的反应出奇地缓慢和犹豫，这可能是受到9月底在纽约市召开的联合国大会的影响，亦或是 Khamenei 可能选择默不出声，以隐身于公众面前来应对。

国家在整个抗议运动中的一系列回应手段，正显示出这个政权的专制性质。其中包括：封锁网路、策划丰富的亲政府游行运动、用橡胶子弹和漆弹射击抗议人群、逮捕抗议者和艺术家、诋毁抗议者的名誉、破

坏鸣喇叭支持抗议的车辆、抨击伊朗侨民、将抗议活动归咎于外国势力、歪曲事实及口号和事件。

尽管监护委员会和专家会议成员Ahmad Khatami 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官 Hossein Salami 等国家官员，威胁要对抗议的伊朗人作出处决等严重的处分，但抗议活动并未减弱；甚至在首批囚犯遭受酷刑、强奸和处决的案件公开后也没有。

在伊朗抗议运动仅仅只过了几个月的情况下，要知道抗议活动会如何发展还为时过早。绝大多数沉默和缺席的伊朗人以及持不同政见的神职人员，何时会加入示威活动还有待观察。与此同时，出现了（一群）领导人，他们开始建立组织和联盟，并针对推翻后的结果提出了几项具体的要求。在经过国际社会上曝光度最高的初期之后，这些抗争往往进入常态化并在世界各地的新闻版面中消失。这种情况是否会再次发生以及国际社会对伊朗政权的立场将会是如何，还有待观察。■

来信寄至全球对话编辑团队：

<globaldialogue.isa@gmail.com>

